

沈从文著

新 烛 虚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3)

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

新 烛 虚

(散文部分)

沈从文著

目 录

丁玲女士被捕	1
丁玲女士失踪	5
劝人读经	8
知识阶级与进步	10
禁书问题	17
关于看不懂	26
论读经	33
尽责	39
中国人的病	44
给青年朋友	50
一种态度	57
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报国机会	61
——给湘西几个在乡军人	
变变作风	72
读《论英雄崇拜》	76
穷与愚	90

丁玲女士被捕

丁玲女士这个名字，应当是许多人所熟习的名字。近来得到几个朋友来信，方知道她在上海租界上，已被几个政府的便衣侦探，用绑票方法捕去了。捕去以后就下落不明，凶多吉少。上海地方绑票案件极多，想不到还有政治绑票！

政府对于这类事情，按之往例，便是始终一个不承认。对于捕去的人，常常不经由正当法律手续，多用秘密手段解决。如往年胡也频君，因左翼作家运动失踪后，至今犹无人知道他所犯何罪，且不明白他的死去，究竟如传闻所说，用麻袋沉到黄浦江心呢，还是活埋地下。

政府对于共产党的处置，几年来有他一贯的政策，为党，为国，为民族，不管用什么名义去说明，采用非常手段去扑灭他，残酷到任何程度，仿佛皆不

足惊异。譬如在江西，我的一个朋友，就亲眼见到过军队用一大桶石灰解决过二百余名逃兵的事。朋友说完他那点稀有的经验时，就告我，“这是战争！”因为他这一句话，我便遇事装成看得十分平常了。既要“战争”，写这一页历史，难道上好的血不用，还去用那由于哀怜而来的眼泪么？

但我要说的是对于一个年青作家，本身同战场距离得那么远，他的住处又正是司法机关极其完备的大都市，他的活动也只限于用一支笔写一篇两篇小说，是不是还得政府使用处置土匪处置敌人的方法来教训他？

丁玲女士只是一个作家，只为了是一个有左倾思想的作家，如今居然被人用绑票方法捕去，毫无下落。政府捕人的方法既如此，此后审判能不能按照法律手续，也就不问可知了。国民党近年来对于文艺政策是未尝疏忽的，从这种党治摧残艺术的政策看来，实在未敢苟同。象这种方法行为，不过给国际间有识之士一个齿冷的机会，给国内年青人一个极坏印象，此外就是为那政策散播一片愚蠢与不高尚种子在一切人记忆中而已。执柄当权的人若贤明达识，就不会采用这种政策。纵或作了这种事情，也明白如何去补救。为政府计，既偷偷悄悄把人提到了，若这人实在有罪，就应当罗列罪款，该死的，置诸典刑，人无间

言；罪不至于死的，斟酌轻重，坐牢罚款。政府既以法绳人，自己一切行为，就应当从法律入手，有罪无罪，事情应由法庭处置，且应给堂下人一个在法庭上辩白的机会。

如今丁玲女士究竟押在何处，无人明白，所犯何罪，也不明白。且据传说，则其人又有业已为某方害死的消息。这传说我希望它不是事实，但政府也应当用别的方法证明，这是个不实谣言，且应当即刻公开审讯。人若当真已死去，活埋也好，缢杀也好，仿照别一处处治盗匪方法套石灰袋也好，政府既只知道提倡对于本国有知识青年的残杀，所用方法即如何新奇，我也绝不至于因其十分新奇，另外提出抗议。因为每个国家使用对知识阶级的虐杀手段时，行为的后面，就包含得全个的愚蠢。这种愚蠢只是自促灭亡，毫无其它结果。

在极愚蠢的政策下，死者死矣。然若果稍能自强不息，知对现状有所不满，敢为未来有所憧憬的作家，皆如此一去无踪，生存的，则只剩下一群庸鄙自熏之徒，当全个民族非振作无以自存的时节，还各装模作样，以高雅自居，或写点都市文明浮面的光色，或填小词造谣言以寄托其下流感情。阳充清流，以文学作消遣，于政府官办各刊物中，各看手腕之修短，从所谓党的文艺政策下会计手中攫取稿费若干，无

事便聚处一堂，高谈希腊、罗马以送长日。即由此上海小有产者与小游民兴味与观念，支配国内年青人兴味与观念。政府于积极方面既杀尽有希望的作家，于消极方面，则由政府支出国库一部分金钱，培养这种闲汉游民，国家前途，有何可言！

五月二十五日

丁玲女士失踪

近月来在中国发生了一件稀奇的事情，就是作家丁玲女士失踪的消息。这件事自从报纸传出后，从各方面探听，皆无这个人的下落。据外报的消息，则丁玲女士的失踪，出于政府特务机关的诱捕，用的是绑票形式捕去，捕去之后，从此即无踪迹。但消息传出以后，各方抗议营救的较多，上海公安局乃申明被捕者并无丁玲其人，然事实上则人业已被捕，且非由法律手续捕去。十几天前，她曾从另一人传出一个口信：

“我已被人诱捕，不自由。”

被“捕”被“绑”不过是词义上的分别，她的失踪由于政治关系，毫无可疑。……上海绑票固已成为某种人的专业，但总想不到在政治方面，也居然有人采用这种手段，对于一个作家，使其忽然失踪。

我们对于上海市公安局的申明无可怀疑，因为拘留所若干年青政治犯中，当真未必有“丁玲女士”这个名字。这理由不出两点，极易明白：其一，丁玲被捉，不敢承认她是丁玲。其二，被捕由特务机关执行，直属南京某一方面，不必经公安局办理什么手续，公安局也难过问。两种理由必居其一，或者两种理由兼而有之，即或人是公安局正式会同租界探员逮捕，然失踪之后，则传闻曾一度拘留公安局也。

中国当前有两个危机，一面是国家那么穷，一面是国家那么乱。一切皆似乎毫无头绪可言。国民党为了自己政策的推行，弄死几个反对这种政策的人，并不算得什么稀奇事情。因为拥护自己的主张，牺牲一些人，在共产党看来也一定认为十分平常。不过在共产党看来尚以为极不合理的“暗杀政策”，若国民党居然用来作为对作目前一个平常作家的手段，这种政策实在愚蠢得很。这种手段对于个人牺牲固不足道，对于各方面所得的印象和影响，将成什么结果？

照我个人看来，恶例一开，由于这种不聪明的政策所造成的局面，它的坏处恐怕将超乎我们所想象到的坏处以上。一面凡是甩笔对政府表示抗议的青年人，皆有凭空失踪的可能，另一面是学会了用同样方法的报复。若必须到那时节再来清算过去错误，为时未免晚了一点。

政府应当明白，尽把一些稍有生气的青年作家捉去秘密解决，是不成的。这种愚蠢事作了不止一次，实在不应当再作下去。政府一面正在提倡法律，一面又这样蔑视法律。前些日子把年青人捉去时，还形式上尽些法律手续，如今对于一个无罪可坐的作家，居然用这种方法捉去，国民党中若还有知正义明道理的人，就应当出来说几句话。爱护国民党的人，若明白这是政府所作的一件事，也应当站起来说几句话。

政府应明白的是：对于作家秘密逮捕秘密解决的手段，不是一个明智的手段。作家没有一个兵，又没有什么党，他既只是用笔构成他的罪过于前，似乎也只能用笔写些什么抗议于后。但若同时大多数作者都来提倡政府的暗杀政策，提倡受迫害与被虐待者用暗杀来对付政府行为作报复时，政府得详细估计一下那种后果。

为这件事情抗议的作家，人已不少，其他暂时沉默的，也正在等候政府一个合理的处置。这个人不能用“失踪”作为结论，她若因此失踪，我的预言是，将来还会有若干作者，相信除了告年青人“自卫”且指示出自卫方法以外，别无再好的话可说。

一九三三年六月四日

劝人读经

《百喻经》说：

往昔有夫妇两人，烘了三个大饼，作为晚餐。大饼烘就，夫妇二人各自吃尽名分下的一个饼后，还剩大饼一个，不便给谁独吃，于是互相约定，不许说话，谁若先说话，就莫吃饼！两人既然互相约好，便坐在家中，沉默不语。到了半夜，来了一个贼徒，到家偷窃东西，掠尽家中所有宝物。两人皆因有约在先，关怀大饼，谁也不愿出声。贼人眼见这家中人痴呆如此，胡来乱为，舍不妨事，且觉得主妇静婉可人，便傍近妇人，作了些小小轻薄行为。那丈夫虽亲眼见到贼人胡闹，却仍因为不忘记那个大饼，故不作声。到后妇人忍无可忍了，就叫唤她的丈夫：“大伍，大伍，你真是个傻子，为一个饼，尽人把我如此侮辱调戏！”那丈夫快乐得拍手大笑，他说：“咄，咄，愚蠢丫头，

你已说话，你输定了！饼应归我，你已无分！”

这是两夫妇的问题，谁最愚蠢，别人似乎不能置喙，轻易加以判断。《百喻经》故事所注重的是人的性格。千年前世界上既俨然曾经有个这种丈夫，这性格也似乎就有流传到如今的可能。我们如今已不容易遇到这种丈夫了，但却可从别种人物的治国政策生活态度得知一二。譬如说，一大片土地忽然丢了，或家中老婆跟人跑了，有些人不正是因为守着一点类似有关大饼相的约言，不发一言不作一事，沉默支持下去？若有人说了一句话，想提醒他，这些人不正是顷刻之间就会天真快乐的向人喝着：“咄，咄，蠢东西，大饼归我了！”

读到这本充满了愚人故事的小书时，我总疑心写这本书的人，书虽在一千年以前写成，他的讽刺却预备留给一千年以后。不过如今争大饼的聪明人，大都忙忙碌碌，虽作了不少不折不扣的蠢事，却好象从不曾注意到这样一本小书上来，因此这讽刺，也等于无用了。若希望他有用，又似乎还必需从现在起始，再过一千余年，才能为作主人的明白的。

不过我总想介绍这本书给那些应读这本书的人。

一九三三年十月

知识阶级与进步

若从一般物质上着眼，人类的进步便很显然的陈列于吾人面前。但从理性方面说来，则所谓人类，现在活着的比一千年前活着的人究竟有何不同处，是不是也一般的有了多少进步？说及时实在令人觉得极可怀疑。

假若我们承认了理性也有进步的可能，想取例来说明它，一个写故事的人，自然还是引用个故事较为方便。一千四百年前，中国就有那么一个故事：

有个小小村落，距离国王的都城约三十里。既已聚集成村，自然就住了一些顺民，所有男女老幼，皆在四季中各尽手足之力，耕田织布为活。也按时缴税纳捐，照习惯唱戏、求雨、杀猪、敬神。照本性哭、笑、相骂或赌咒。那村中有一口井水，味道极美，无意中被一个专向国王讨好

的人发现后，就把那井水提上一桶，献给国王。世界上作国王的，大都相差不远。他的天下若从马上得来，则莫不粗暴如同一个屠户；他的天下若从爸爸传来，则又莫不糊涂得同傻瓜一样。这国王应属于第二种人。这国王第一次尝到井水极好，就下了一个手谕，指定那村子里百姓，每天轮流派出一人，把水挑到京城里去。国王为了一点点水还那么认真，照例应当是那个村中百姓的光荣。但为了这样一担井水，村子里每天便应当有一个人来回走六十里路，这人这一天别的事自然皆不能作了。国王命令既无从违抗，遵照命令又实在太折磨人，因此那村里的人，大家就暗地里商量，讨论出一个办法，来逃避这差事。办法是离开这个小小村落，各自到别处地方去谋生。

消息为本村村长知道后，赶忙稳住了乡下人，要他们莫即搬家，等他到国王处去看看，是不是能够为他们想得出一个更好的办法。村长见过国王稟明来意，那国王就说，嫌路远，我明白了。如今我下一个命令，把三十里改为十五里，路程减半，不应当再说什么了。（照例世界上最颀预国王，对于小民这样玩把戏说谎总是极在行的。）村长便把国王的话转述给乡下人，

乡下人头脑简单，以为因此一来，三十里的路程当真已缩短一半，故全体皆十分欢喜，就再不作迁移打算了。他们并且对于国王所给的恩惠，十分感谢，为了表示这点感谢，各人便在额角刻了“永作顺民”四个字。

这故事说明一千四百年前，已有人感觉这些头脑简单的乡下人，愚蠢得如何可笑可怜，故特别记下来，为后世启蒙发愚之用。当时的人虽能说出这样故事，且明白一个国王并不能够把原本三十里的路程缩成十五里，但在当时便依然有许多事受那个国王的欺骗，同时对于国王的存在，也从无一人有所怀疑。现在就事论事，则情况已不大相同。第一件事，国王的名分已为一些人用文字、口舌、力和血把它除掉，同时附属于那个名分下的许多坏处也没有了。第二件事，即或有国王的地方，住在离国都三十里的乡下人，已不必为国王轮流挑水了。第三件事，国王或代替国王而来的执政者，在募捐、征用以及其他摊派向国民说话时，也再不能用缩短里数一类简单方法愚弄人民了。这三种事似乎皆可证明属于人类理性的进步，是一种确定的事实。

过去的人把命运和权力全交给了天，国王既称天子，就有权任意处置一切。故作帝王的若本领好，能负责，肯作事，一切又处置得比较公平，大家就有

福同享。国王若是个脓包，不能作事，或不会作事，这个国操纵在军人或权臣手里，于是就有了党争同战事。党争结果常把若干正派的人加以放逐与杀戮，战争则战事一延长，人民担当了那个生灵涂炭的命运，无数的生命，以及由于无数代生命思索与劳作积累而成的一点点文化，便一股脑摧毁了。现在的人民呢，虽仍然把权力交给执政者，却因为知识进步了些，对于一国未来的命运，似乎常常得加以关切。尤其是被称为知识阶级的读书人，多知道些事情，总特别盼望自己的国家发展得好些，国家局面乱糟糟到不成个样子，他们心里是不舒服的。若我们想找寻一种理性发达的人作为代表，把这类人拿来备数，自然是合式的了。

不过也正因为有了这类仿佛理性发达的人，成为社会的中坚分子，人类理性真的是否进步，进步了对于一个民族又还有些什么益处，倒又成为可商量的问题了。

罗马的灭亡不是一天一月的事，就正因为它的成立也不是一天一月的事。坏的坏下来若是几十年，要它好自然也得这个数目。但一般人的感情或理性，却常常不许他们对“时间”这种东西有何认识。比如在中国，提到“国家政治制度的不良”，“民族特性的消失”，以及类乎此等问题时，一般人对于这些问题

所引起的忧虑，忧虑中便从无时间的观念在内。故一切改良的企图，也常常不把必需的时间安排进去。若这种对于一时间的疏忽可称为天真，那么，中国读书人的天真，实在比任何种人皆多一些！比如国家积弱数十年，要力图自强，应当二十年才有小小的希望。一个执政者若老老实实把这个数目告给一般人，且在这个必需的时间中计划一切，则这领袖除准备下野以外，别无其他办法。这人下野了，代替而来的，必是个善于说话，在谈话中能把二十年的时间减至最短期间的人。本来需要十年的，执政者若说：“这件事至多三年，一切便可弄好。”只需要执政者把话说得极其得体，语气又漂亮从容，对国运怀了过分关切的读书人，就会很快乐那么自作安慰：“这好了，我们有了这样好领导，国家命运有了转机，知识阶级的出路有保障了。”事实上，则这些人所注重的，或不是“民族出路”的保障，而是“知识阶级”出路的保障。所谓读书人，学上古史，学西洋文学、中国文学、政治、艺术、哲学，……这一类少数的人，照例是欢喜发表意见同时也欢喜发发牢骚的。这一类社会上的中坚人物，既从自己职业上得到了生儿育女生活凭借，又从一国领袖处得到了一份说谎的安慰后，便会各自去作应作的事情，或收集点古物，或到处托人去打听会做饭菜的厨子，或年近半百尚怀了童心去

学习跳舞，或终日无事便各处去转述点谣言，再也不过问这个国家一切命运了。这些人虽头上不能发现什么刻好的记号，也从不为国王挑水，但这种人的天真与理性是无从并存于同一头脑中的。

也有人说，使多数读书人，能够各自在职业上与嗜好上得到了生存的兴味，安分守己，不乱说话，泰然坦然的吃肉喝汤打发每个日子下去，是一种国家希望进步需要秩序时必不可少的基础。故几年来知识阶级的沉静与颓废，据他们的自辩，据乐观主义者或糊涂蛋代为说明，皆莫不以为这是国家一切事业渐上轨道的象征。其实假若这类人最低的理性，还可以许他们明白，“统治者假若永远是一群大小军人，日以抽收烟捐添购枪械为事，一群油滑政客，只会因循苟且支持现状，一遇应当向国民说谎时就胡乱说一阵，本身只是个军阀的清客，国家由这种人来处置，国家既无法持久，秩序进步也永远得不到。”那么，这类书生的生活与观念，或者也许就稍稍不同一点了。

事实上是古今作平民的，生活态度与观点皆由于为一个天生懒于思索容易被骗的弱点所控制，照例只注意到自己今天能不能活，不大注意明天。且同时只把善于解释解释政策的首领当成最可靠的首领，并不追究政策的得失。故所谓理性的进步，从某

一点说来，我们不过指的是，现在的无冕国王，已想出方法派遣知识阶级挑水，同时在任何人的额角上，却看不出刻过什么显明记号而已。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北平

禁 书 问 题

近十年来本国人把文学对于社会的用处，以及文学本身的能力，似乎皆看得过于重大了些。在野达士通人，认为这个东西可以用来作为治国平天下工具的很多，在朝官吏委员把它当作治国平天下工具的也不少。因此自然而然发生了如下现象，就是对于作家的迫害及文学书籍的检查与禁止。

据近日上海方面的消息，中央通令应查禁的书籍到二百种。这真是一个可观的大数目。有些人的著作一部分被禁止，有些人的著作则已全部被禁止。为什么这些书籍全被禁止？住在北平方面的人，是无法从当局的文书法令中弄明白真正问题的。这个查禁通告据说是出自中央的。我很怀疑这些被查禁的文学书籍，有多少种曾经为通过这个议案的委员先生们阅读过。负责审查的个人，是不是曾经把这些书籍

都细心看过一遍，我也觉得怀疑。就通常禁止的理由，大多数总以为是“为了这个社会秩序的维持与这个民族精神方面的健康上着想”，因此不能不加以取缔。我是个欢喜秩序的乡下人，我同意一切真正对于这个民族健康关心的处置。但对于由事实上说来，不少并无什么坏影响的文学书籍，在难于索解的情形下，忽然全被禁止出售，且同时关于书店纸版与剩余书籍，也无不加以没收，付之一炬，这行为我觉得真的很稀奇。这不过分了吗？对于这些书籍的处置，真有“非如此不可”的理由吗？若这些作品包含的理想真已深入人心，书一烧就完事了吗？我极希望当局有一点比“迹近反动”的措词更多一些的具体说明，免得使后人在历史上多有一件十分含混的记载，免得被人把这件事与两千年前的焚书坑儒并为一谈。

文学被一些读书人看得俨然异常重大，实有理由可说。这些人照例多是两手空空不在其位的，无权无势的。这些人生存到这个混乱贫穷内战连年国家中，忍受种种痛苦与侮辱，眼见耳闻这个国家一切愚昧与腐败情形，想把自己本身那点儿力量，渗进社会组织里面去，使这个民族多少健康一点，结实一点。因为自己所学的是文学，承受了一个新的文学理论，有所努力。也仍然因为自己所学的仅仅是文学，对于目前国家社会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解释得照例常常

比事实简单一些。凭了文学者富于幻想与热情的气质，在工作中希望一种奇迹，且因为对于这种奇迹的期待，各人带着点儿宗教的倾心，与目前这个为“应付眼前事实丧失人心而存在的政府”当局，意见不可避免会有龃龉抵触，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但政府若认识这问题比较清楚，便明白处置的方法，不会把不适用于两千年前的蠢事重演了。这些优秀公民，原是爱他们自己的国家，绝不下于任何当权达官贵人或部长厅长的。他们只是个作家，他们努力从事于艺术，是为了使这个民族增加些知识，减少些愚昧，为这个民族的光荣，为这个民族不可缺少的德性中的“互助”与“亲爱”，“勇敢”与“耐劳”，特别重要是一腔爱国热忱，加以铸像似的作品的制作，很诚实也很穷苦的各自独立分布在国内各处地方，过着极端简陋的日子。政府既从不知道对于这种人加以关切，商人因书业萧条，又对他们待遇吝啬。他们通常的收入，在上海方面，甚至就从不能够从从容容过一天较好的日子。病了无法就医治疗，文章不能出卖，又难于寻找其他职业时，如近日投江的某君，去年病死的某君，皆莫不把一生结束在一个最悲惨的死亡里。他们坚苦卓绝的精神，他们轻于物质寻觅而勇于真理追求的人格，是民族中一种如何难得的品质！政府不理睬他们，也还罢了。如今对于这种人总象放心不

下，不断加以压迫与摧残，所用的手段，又是那么苛刻的手段，实在是国内多数人难以索解的！这些人在这种国民生产力十分凋敝，国际资本主义压力无法摆脱，全个民族正陷入一个十分悲惨的命运里去的时节，担心到可恐怖的未来，认为这个民族若不甘心堕落与灭亡，必须认识现在的环境。因此对于鸦片烟公然的流行，农村经济的萧条，知识阶层中某些人的只知独善其身，官吏阶层的贪赃无识，以及军官种种极端嚣张跋扈处，加以坦白直率的指摘，他们在作品中一点作者对于这个民族复兴的意见，因为他们过分被现状所刺激，必不可免有激越偏持的呼喊，政府若真正为民族生存着想，对于这些人的意见，难道还不应当同情并加以考虑吗？如今当局却只从上海商人方面，看到一点毫不切于实际的关于作品流布的消息，以及从另一方面，某种人为了邀功牟利不惜故意张大其辞的下级报告，便对于处在中国这种困难境遇下的作者，加以压迫与摧残，全然不象一个正在希望国内一切渐有秩序政府所宜采取的政策。就三四年来的上海方面作家所遭遇的种种说来，在中外有识者的印象中，所留下的恐怕只是使人对于这个民族残忍与愚昧的惊异，其他毫无所得。如目前这种处置，当局诸公中，竟无一个人能指出它的错误，实为极可惋惜的事情。（我想特别提出的，是那些曾经

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的过来人，当前主持文化教育的当权派。)

文学在别一国家别一民族中，或者也发挥过某种特别的作用。“光焰一世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中植下了促成二十世纪那个民族崭新人格的种子，与革命爆发成为不可分离的东西”，这说明自一个文学史的叙述者口中说来，并不觉其过度夸张。但多数人若只是单记着这些历史的轮廓，便打量从自己国家自己行为方面产生一页新的历史，必然还有许多待明白的问题。在环境截然不同习性截然不同的两个民族中，历史是照例不至于同样重现的。把某种已成定型的文学观，移植到另一个民族另一个国家中去时，所需要的修正，将到何种程度，这些理论方能发挥它的能力？在一种被修正的理论下，一些作品又应在何种形式下产生，所侧重的必在某几点，方不至于使作品与社会革命失去其当然的联系？有了这种作品，这种作品对于全盘“活动万变”的政治，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它的重要性又居于何等？上海方面从事文学运动者，在一种缺少自由缺少衣食朝不保夕的生活情况中，事实上就不可能有人能有暇裕来对于这些问题详细加以研究。在中国目前这种景况下，文学能够做些什么？宜于从何方面着手？它若不宜离开社会，且应当同政治理想揉成一片，间接或

直接促进政治的机能，应如何去安排？假若它在某一时节某一限度内能够发挥它的作用，那种“富于活动性与弹性”的政治机构，又如何方能与“拘束于一定篇章”的文学作品相呼应相结合？这些问题，不单求生不遑寓居在上海一隅的穷苦作家们无法注意得到，便是人在南京，泰然坦然的按月从国库中支取相当丰厚的薪水，置身在中央宣传部当差办事的三民主义文学理论家，三数年来不是还不曾写出什么稍稍象样的文章吗？正因为便是左翼也还缺少一种具有我们这个民族丰富的历史知识的文学理论家，能作出较有系统的理论与说明，致从事于文学创作的，即欲以“唯物论”的观念为依据，在接受此观念之际，因理论者的解释识见的不一，致作者对于作品的安排，便依然常有无所适从之概。三数年来的挣扎努力，予反对者以多少借口，予同情者以多少失望，同时又予作家之群以多少的牺牲！且只从目前上海一隅文学出版物的数量统计上稍加注意，就可以知道一般文学作品在国内流行的情形。那些带一点儿较新倾向，不颓废，不谐趣，不堕入恶俗猥褻习气较慎重的文学刊物，在一般刊物的分配比较上，所占有的又正是一个如何可怜的数目！这种作品流入社会里去，固能影响不少青年人，同时这些青年人，却就又将如何受一种恶习惯的惰性所吸引所控制！官方若

不缺少那点必需的冷静与诚实，对于几年来文学运动在国内发展的情形加以注意，便不会把这几年来在数万万饥民中仅仅只限于大学生和中学生中流行的一千部或三千部的作品所引起的作用看得过大了。因为一方面是把一个新的文学观移入中国，还缺少能密切配合理论要求作品的应世，一方面又由于政府的无知，对于目前文学的恐怖与厌恶，把现在的革命文学对于中国社会革命的影响看得过分重大，因此在上海左翼作家方面，便有了种种的变化：部分原来对于左翼文学抱有理想的，有人向右转了。又有一些作家，因为不愿意同这个对文化只知摧残的无能政府合作，便同情左倾了。再有一些作家，就是那些对目前政府一切措置均抱反感，对社会主义有所倾心，在现状下抱残守缺困守租界一隅的左翼作家，在穷困与迫害交加中，死守残垒，以沉默来支撑现状应付现状。一些人信念与行动中间的矛盾处，既无法可以调和，矛盾的延长，自然是一种很大损失。

近年来大学生中学生左倾思想的普遍，以及对于左倾思想的同情，政府若认为是文学的影响，而忘了社会现实那一面，实在是最大的错误。几年来政府对于青年的措置，实在可以说是无往不在那里抛弃青年。当局方面对于青年人左倾思想的发展，不追求它的原因，不把这个问题联系到“社会的黑暗与混

乱”、“农村经济的衰落”及其他情形考虑，不对于他们精神方面发展加以注意，不为他们生存觅一出路，不好好的研究青年的问题，就只避重就轻，把问题认为完全由于左翼文学宣传的结果，以为只需要把凡稍有倾向的书籍焚尽，勒迫作家饿毙，就可以天下太平。这种气算实在是太幼稚，对国事言太近于“大题小做”，对文学言又象太近于“小题大做”了。

多数人所希望的政府，是一个能“办事”而且也极“懂事”的政府。因为目前有许多事并不是政府权力能否执行的问题，实在是政府明白如何节制权力或滥用权力，引起国内外有识者对政府厌恶或绝望的问题。关于禁书这件事，出于中央党部或中宣部，还是出自国民政府，我们不知道。若出自中央党部的宣传部文艺科，我不想说什么话，因为这也许就是国民党中这些小官僚认为最重要的工作一种。但若果这件事出自国民政府行政院与教育部，或行政院与教育部还可以来过问一下，我却希望凡是这一次被禁止的文艺书籍，能够即早交付一个有远识的委员会全部重新加以审查，看看其中究竟有多少书籍必需禁止，有多少书籍不应禁止。朝野都不妨仍然承认文学是个治国平天下的工具，正因为既当它是个治国平天下的工具，一切都宜出之于十分慎重。在世界上我们不是极不愿意被别一国家别一民族把我们当

成野蛮人看待吗？希望从别人方面得到尊敬，第一步就应当是自己不作出野蛮人的行为。

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关于看不懂

适之先生：

《独立评论》第二三八期刊载了一篇絮如先生的通信，讨论到一个问题，以为近年来“不幸得很，竟有一部分所谓作家，走入魔道，故意作出那种只有极少数人，也许竟没有人能懂的诗与小品文”。从那个通信，还可知道絮如先生是一个中学国文教员，已然教了七年书。他的经验，他的职务，都证明他说那些话是很诚实很有理由的。但就他所抄摘的几段引例，第一是卞之琳先生的诗，第二是何其芳先生的散文，第三是无名氏大作。卞之琳的诗写得深一点，用字有时又过于简单，也就晦一点，不特絮如先生不懂，此外或许还有人不大懂。至如何其芳的散文，实在说不上难懂。何先生可说是近年来中国写抒情散文的高手，在北大新作家群中，被人认为成绩极好的一位

(其散文集《画梦录》，最近且得到《大公报》文艺奖金)。但絮如先生看了他的文章，却说简直不知道作者说的是什么。同时您的按语，也以为写这种散文，是“应该哀矜”的，而且以为“其所以如此写些叫人看不懂的诗文的人，都只是因为表现能力太差，他们根本就没有叫人看得懂的本领。”我觉得有些意见，与你们的稍稍不同，值得写出来同关心这件事情的人谈谈。

一，为什么一篇文章有些人看得懂，有些人却看不懂？

二，为什么有些人写出文章来使人看不懂？

三，为什么却有这种专写些使人看不懂的文章的人？

四，这种作家与作品的存在，对新文学运动有何意义？是好还是坏？

我想先就这四点来作一个“散文走入魔道”的义务辩护人，先说几句话。

其一，文学革命初期写作的口号是“明白易懂”。文章好坏的标准，因之也就有一部分人把它建立在易懂不易懂的上头。这主张是您提出的，意思自然很好。譬如作一篇论文，与其仿骈文，仿八股文，空泛无物，废话一堆，倒不如明明白白写出来好些。不过支持或相信这个主张的人，有两件事似乎疏忽了。

一，文学革命同社会上别的革命一样，无论当初理想如何健全，它在一个较长时间中，受外来影响和事实影响，它会变。（且会稍稍回头，这回头就是您谈中国西化问题时所说的惰性。适宜于本来习惯的惰性。）因为变，“明白易懂”的理论，到某一时就限制不住作家。二，当初文学革命作家写作有个共同意识，是写自己“所见到的”，二十年后作家一部分却在创作自由条件下，写自己“所感到的”。若一个人保守着原有观念，自然会觉得新来的越来越难懂，作品多“晦涩”，甚至于“不通”。正如承受这个变，以为每个人有用文字描写自己感觉的权利的人，也间或要嘲笑到“明白易懂”为“平凡”。作者既如此，读者也有两种人，一是欢喜明白易懂的，一是欢喜写得较有曲折的。这大约就是为什么一篇文章有些人看不懂，有些人又看得懂的原因。

其次，有些人写文章看不懂，您的意思以为是这些人无使人明白的表现能力。据我意见，您只说中一半。对于某种莫名其妙的模仿者，这话说得极有道理。但用它来评当前几个散文作家的作品，和事实似乎稍稍不合。事实上当前能写出有风格作品的，与其说是“缺少表现能力”，不如说是“有他自己表现的方法”。他们不是对文字的“疏忽”，实在是对文字“过于注意”。凡过分希望有他自己的作者，文章写来

自然是不大容易在短时期为多数人全懂。（除非他有本领用他的新风格征服读者，他决不会与多数读者一致。）不特较上年纪的读者不懂，便是年事极轻的人也会不懂。不过前者不懂（如絮如先生），只担心文学的堕落，后者不懂（如一般学生），却模仿得一塌糊涂罢了。

其三，这可分两方面来说。一是就作者说，他认定一切站得住的作品都必需有它的特点，这特点在故事处理上固然可以去努力，在文字修整排列上也值得努力。一是就读者说，读者不懂不一定是多数，只是受一个成见拘束的一部分。既有读者，作者当然就会多起来了。

其四，由第一点看去，中国新文学即或不能说是在“进步”，至少我们得承认他是在“变动”。目的思想许可它变，文体更无从制止它不变。就它的变看去，即或不能代表成就已经“大”，然而却可说它范围渐渐“宽”。它固然使中学生乐于模仿，有不良影响，容易引起教员的头痛，对新文学的前途担心。但这些渐渐的能在文字上创造风格的作者，对于中国新文学的贡献，倒是功大过小。它的功就是把写作范围展宽，不特在各种人事上摆脱拘束性，且在文体上也是供有天才的作家自由发展的机会。这自由发展，当然就孕育了一个“进步”的种子。

适之先生，如今对当前一部分散文作品倾向表示怀疑的，是一个中学国文教员，表示怜悯的，是一个文学革命的老前辈，这正可说明一件事，中国新文学二十年来的活动，它发展得太快了一点，老前辈对它已渐渐疏忽隔膜，中学教员因为职务上关系，虽不能十分疏忽，但限于兴趣认识，对它也不免隔膜了。创始者不能追逐时变，理所当然。但一个中学教员若对这种发展缺少认识，可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所以我认为真正成问题的，不是絮如先生所说“糊涂文”的普遍流行，也许倒是一个中学国文教员，在当前情形下，我们应当如何想法，使他对于中国新文学的过去现在，得到一个多方面的认识。且从这种认识上，再得到一个“未来可能是什么”的结论。把这比较合乎史实的叙述也比较健全的希望，告给学生，引导学生从正面去认识一下中国新文学，这件事情实在异常重要。不过关于教员这点认识，是尽他自己去努力好些？还是由大学校帮他们一点忙好些？中学教员既多数是从大学出身的，由大学校想办法应当方便得多。

我这点看法假若还有一部分道理存在，我们不妨就一般大学校中国文学系的课程表上，看看负责的对这问题有多少注意。检查结果会有点失望，因为大学校对它实在太疏忽了。课程表上照例有“李白”“杜甫”或“文选”的专题研究，有时还是必修课，一

礼拜上两小时或四小时，可是把明清“章回小说”的研究列入课表上的就很少。至于一个学校肯把“现代中国文学”正式列入课程表，作为中国文学系同学必修课程的，那真可说是稀有的现象。（有的学校虽有一两小时“文学习作”，敷衍敷衍好弄笔头的大学生，事实上这种课程既不能造就作家，更不能使学生有系统的多明白一下新文学二十年来在中国的意义。）大学校对这件事的疏忽，我们知道有两个原因，一是受规则影响，好象世界各国大学都无此先例，中国当然不宜破例，损害文学系的尊严。二是受现实拘束，找这种教授实在不容易。重要的或者还是“习惯”。负责的安于习惯，不大注意中国特殊情形。临到末了，我们不能不说各大学负责者对于这问题认识实在不够。因为他如若明白中学生读的课本虽一部分是古典作品，其余所看的书大部分都是现代出版物。中学生虽得受军训，守校规，但所谓人生观，社会观，文学观，却差不多都由读杂书而定。感于这个问题的重大，以及作中学教员责任兴味对学生关系如何密切，也许在大学课程中，应当有人努力来打破习惯，国文系每星期至少有两小时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作为每个预备作中学教员的朋友必修课。若说教员不容易得到，为什么不培养他？为什么不再打破惯例，向二十年来参加这个活动，有很好成绩，而且态

度正当思想健全的作家去设法？

我想提出这个问题，请所有国立大学（尤其是师范大学）文史学系的负责人注意注意。且莫说一个教师对于文学广博的欣赏力，如何有助于学生。只看看教育部课程标准，在初中一年级教本中，语体文即占百分之七十，高中教本语体文依然还有一部分。可是那些人之师在学校读书时，对这方面的训练，有的竟等于零。他不学，怎么能教？这不特是学校的疏忽，简直是教育部的过错。

我很盼望听听您对这问题的意见。

沈从文。六月十八日

论 读 经

上年来各方面常常可以听到“恢复固有道德”这句话。说及恢复固有道德时，就使人联想起“读经问题”。两样东西原来是混在一块分不开的。广东湖南的军事领袖，据说对于这件事就特别热心。且闻从今年起，两个省分凡属学校，不问学生大小，皆一律实行读经。人若不是个傻子同疯子，必会明白，徒然提倡读经，对于中国当前或以后一系列严重问题毫无补益。如今居然有人提倡，有地方实行，可算得是很稀奇事情。把提倡读经的原因追究一下，我们便可以知道读经空气越来越浓厚，不外乎一二在军人幕中挥鹅毛扇的高等师爷，稍稍读了点旧书，各在那里做梦，梦想用“儒术”来治国平天下。他们有了说话机会时，因此就怂恿当局、谄媚当局，旧事重提，试用试用儒术。领袖们呢，自己或者是个秀才出身，也读

过几本旧书，自然容易迷信儒术。或者本人一字不识，正因为一字不识，便相信这些军师的愚妄意见，以为目前的天下国家，即或不能由读经弄好，至少社会秩序还可望从这条妙计上恢复安定。于是读经事件由提倡进于实行，“读经”真成为一个“问题”了。

这问题的提出，可以说是这些迷信儒术的文人武人，妄想巩固个人的地盘、饭碗与权力所作的一种极荒唐打算。就算这些军师这些大帅也希望中国比目前稍好一点，动机是“为国为民”，但他们的知识，只许可他们知道中国有几部经书、中国有这种政术，因此拿来应用，方法可并不高明。

读经既牵连所谓恢复固有的道德，道德是什么？不过是人与人共同活下来时，谋和平安全，减少一点纠纷，使人与人更容易相处的一种东西罢了。道德就个人言代表理性，重在节制与牺牲。（它对个人虽为牺牲，对社会人类则为利益。）它同法律性质稍稍不同，但用处却与法律相似。法律注重在使人不敢作恶，道德却能使人乐于向善。道德即由于人与人的关系而产生，因此多数的道德无固定性，常随人类需要立一个标准，它的价值也就在那并无绝对固定性上面。它能控制人类行为，却仍然由人类行为支持它。人类自然不能缺少道德，但道德也同法律政治一样，有些本质不变，形式则常常得变动。有些此一时需

要，稍过一时又毫无存在的价值。积极提倡道德的有两种人：一为政体统治者的帝王，一为思想统治者的宗教家。对道德取抗议态度的有三种人：一为有见识的思想家，二为诗人，三为革命者。前两种人照例拥护固有道德，后三种人却常常否认道德，修正道德，或创造一新道德和旧的相对抗。想要运用道德来治国平天下，并不是一件可笑的事情，但至少得先明白它的变动性。一个有头脑明战术的现代军人，他训练士兵时，决不会要士兵抛下机关枪，来学习拉弓射箭。一个有头脑懂政术的政治家，他真会为民族打算，也就决不至于再迷信两千年前几本书籍所提到的作人作事方法可以救国！道德本身只是一堆名词，抽象而不具体，用到人事上时，还得把它很艺术的混和在一种形式里。要提倡“礼”，与其教人读一点钟的经书，不如要他们好好的列一次队，把学校规矩弄好，秩序弄好，礼就来了。要提倡“义”，若能把读经一点钟时间，换作爬山下水去救一个人，也似乎比较实在一些。其余所有经书上的道德字眼儿，无一不必需艺术的转到另一件事情上去，方能发生效果。若不明白这一点，却只抬出经书来，想从读经上作天下一统的梦，那与张宗昌当年翻刻经书，不过是五十步百步之比。纵将来经书流遍天下，每人皆熟读成诵，对国家本身的上下贫穷与遍地毒物，能救济不能救

济？对国外的飞机，大炮，洋货，牧师，能抵抗不能抵抗？

目前一些提倡读经拥护读经的人，除了军人还有不少名流大官。这些人自己是不是当真把经书好好的读过一遍，说起来就不免使人疑惑。若果每一个人真能平心静气，来把《诗》、《书》、《易》、《礼》、《春秋》精读一遍，再想想目前中国是什么样一种可怕情形，就会了然上古典籍不能应付当前事实，或许再也不忍心随声附和，让烟鬼的子孙还来用经书毒害一次了。

退一步说，当政者倘若有人读过经书，而且得到经书的益处，作人有大儒风度，作事具儒家精神，个人的确相信经书是一种宝贝，一副良药，且相信令人读经真算得是一种救国政策。那么，当前应该读经的，实为下面几种人：

- 一，国民政府大小官吏
- 二，国民党各级党员
- 三，国内各种军人

因为这些人正是当前社会国家的直接负责者，政治不良这些人必需负责。希望国家转好些，也就得先把这些人弄好。广东、湖南政府有提倡读经的决心同勇气，最先就不妨用它来甄别官吏，奖惩党员，升降军人。如今上述三种人不闻有读经消息，却把它派

给小学生，对子弟辈如此关切，对当前事如此马虎，使人觉得不易理解。

若说小学生即将来的民族中坚分子，也即是将来在这块土地上应付多灾多难命运的公民，要他们读经，为的是替他们将来设想。我们明白如今年龄八岁到十二岁的小国民，当他们二十来岁时，必然遭遇下面几种严重问题待他们解决：

一，中国经济破产以后的穷困；

二，中国因国际大战所受的蹂躏以及战事结果中国所受的宰割；

三，中国因二十年来毒物流行所产生的结果。

若欲训练他们的身心，使他们将来长大时能应付这种困难局面，担负下这种沉重责任，目前最切要的工作，岂是读几本经书所能收效？目前湘粤负责者假如真肯为他们青年人设想，与其勒迫他们读经，不如在最近的将来，呈请中央，把全国学龄儿童来一个五年计划，施以强迫教育，输入几个最基本的道德观念：

一，吃大烟的极不道德，爱国家用国货的极道德。

二，强健勇敢的极道德，懦弱懒惰的极不道德。

三，作人正直，坚忍，结实的极道德，遇事悲观不振作的极不道德。

四，迷信鬼神的极不道德，对科学有兴味的极道德。

一面用社会生活来培养这些道德观念，一面用法律来辅助教育所不及，务必使每个青年人具有一种新国民的性格，即当大难来临时，各自还有活下去的勇气与能力。且使他们在无论何等境遇下，皆不至于如现在负责者那么徒然迷恋过去，疏忽当前。使他们在无论何种情形下，又总不放弃公民的权利同义务；换言之，便是他们还想活，还预备好好的来活！五年计划完成了，再来一个五年计划看看。要这样子，方算得真为他们设想！

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

尽 责

八年前国共两分裂时，湖南省发生了一个清党运动，各地方皆有许许多多青年，从县或区党部与学校课堂里，被人簇拥去割下头颅示众，或在什么会场上与请愿地方，当场用火器扫射而死。这类流血事情虽小乡小镇也受了传染，损失简直无从统计。这些流血的青年，有的年龄不过十四五岁，（其中女的不少，浏阳地方还杀过十三岁的女孩子！）当时那么大规模流血，或许有他必需如此处置的理由，认为杀人便是在那里“尽最高的责任”。这一来，活人的记忆里，便只能永远保留了一个痛苦印象了。若用它来与目前读经运动相对照，更显得我们原来还是活在中古时代，而且历史还正在倒退，使人对于中国明日的一切，有点茫然了。历史如果象一个环，那么，再过十年，倒回来的是个什么世界？是礼乐复古，王道治世，

戴花翎的长驱入关，还是……

历史照例不会如一个环。虽然有些人怀了这种迷信，迷信背后且有种种促成的原因，使少数读书人亦不免一时蔽于迷雾中，以为历史可以逆转，循古是一条出路。然而不成。一切水皆得向海洋流去。最聪明的政治家，他知道有个“明天”，必更注意那个“明天”，而且是个想出办法去如何安排一切使合于明天环境的人。他不会为过去发迷，且绝不误解历史，以为用“过去”可以安顿“将来”。他明白“今古不相法”。他相信在人事上顺逆之间，就寓有个人权势与民族生命存亡之兆。聪明治国者若具有一分聪明九分勇敢的精神，凭这一分聪明应知道历史是怎么回事，那九分勇敢必可造成一页新的历史。若具有九分世故一分傻干的精神呢，这九分世故使他趋于保守，那一分傻干也仍然会否认历史向前直闯。若除了十分迷信他无所有，除了迷信旧的方式，用它来对付当前与未来一切，不作别种新的打算，国家不会上轨道，有秩序，即想维持现状，事势也不许可的。

如今南北有四省皆已提倡读经，这原因当由于各省负责者明白国家样样不如人，一切干不过人，“攘外必先安内”，总得想一条出路。我们不妨相信，这找出路的动机是值得尊敬的。但这些为国家想出路的人，大多数是久历戎行，自以为在尽瘁国事的军

人。他们从戏剧或什么书上知道历史上有个伍子胥，有个岳飞，被后世称为忠臣（国家这时节是需要忠臣的时节）。时势既然还不许他们作伍子胥，又不可能作岳飞。身边几个划策设计的幕僚，则尚未忘却革命军北伐时代所受青年人的轻视与忽视，一面看看时代风气，影响到家中儿女如夫人的行动也真不小，因此“儒道治国”，用经书困辱青年人的政策，先在“文治派”心中成为一个公私两便的有力观念，一有机会时，把它贡献给省主席，省主席大约也想想：“老的给他一碗饭吃就行了，平时捣乱的全是年轻人，这倒是一着棋。”因此读经救国的空气，由南而北，很自然的慢慢地“来”了。据他们的意见，这自然是中国一条出路。他们想出这条“路”的原因，除上述及以外，不容易寻觅更好的解释了。

不拘某种经书，尽青年人熟读成诵，实在无从使他们应付明日中国的种种困难，那是显而易见的。就因为中国目前并不是被符咒弄坏的，符咒当然也不能使它即刻转好。负责者倘若真关心国家的将来，能为国家打算盘，又要来尽一种“最高的责任”时，或想训练青年，得到青年，皆绝不宜用枯燥经书的诵读来折磨他们的神经，却正需要无数活泼新鲜玩意儿，排泄他们的感情，爬梳他们的郁积，发扬他们的志气。与其要他们注意两千年前的断烂朝报，简易人生

观，琐碎而不切于时代的丧葬礼制，就不如用国家力量，集合国内专家，把国民所必需的几种基本道德，加以讨论，用一个新的方法，编成些简明合理与现代精神不相违悖的出版物、电影，以及一切游戏玩具，广播流传，有力而易于收效。如只会单纯提倡读经，经书不发生影响，则糟蹋国民精力，毫无代价。若发生影响，使全国人民尽成及格秀才，更挫折国民应付当前与未来环境的勇气。总而言之，从大处看，这个时代实行读经即近于民族自杀，凡已经实行读经的省分，皆是已经起始在那里自杀。这些官家如此热心，实因为这些官家历史知识不如内战经验充分，把复杂社会看得同简单兵士一样，因此方法误用。他们在“尽责”，可并不知道是在误国害人。

如今援引历史提倡读经的人，既不明经，也不习史，读经又好象已渐渐见诸实行，国内研究经史的专家，到说话的时候了，应当各自老老实实发表一些大胆而公正的意见，纠正这个行将普遍传染的风气，方是道理。“儒道治国”不是句可笑的话语，过去某一时代曾有人用它统一安定过中国。然而如今来运用这个政策的人，至少得先弄明白经书的坏处与好处，看清时代，看清环境，方能行使这个政策。何况我们还有个教育部，各省勒迫大小学生读经，教育部当局似乎也得尽点责任，向国民说明教育部对于这件事

的态度（我知道许多人皆希望教育部能在读经一件事情上表示一点态度）。若不承认读经是大中小学课业内的事，那么，有些省分业已施行的办法，值得注意。若承认读经是必需的事，那么，所有课程标准得根本改变，决不宜那么含含混混下去，使作教员作学生的徘徊歧途，不知所从。

我希望尽责任的感觉，在教育部同专家方面，也不下于各省主席。大家都爱国，都希望中国有出路，且都承认中国得找寻一条比较方便的出路。既然有人在提倡读经了，这是不是一条出路？路走不走得通？公平的讨论决不犯什么罪。若因为提倡的是另一种人，其余各方面就避嫌不便说话，那是逃避责任，此后读经所发生的恶果，算起账来诸公都应记上一笔。

一九三五年四月

中国人的病

国际上流行一句对中国很不好的批评：“中国人极自私。”凡属中国人民一分子，皆分担了这句话的侮辱与损害。办外交，做生意，为这句话也增加了不少麻烦，吃了许多亏！否认这句话需要勇气。因为你个人即或是个不折不扣的君子，且试看看这个国家做官的，办事的，拿笔的，开铺子作生意的，就会明白自私的现象，的确处处可以见到。当政大小官僚情形且格外严重。它的存在原是事实。它是多数中国人一种共通的毛病。但责任主要应归当权的。

一个自私的人注意权利时容易忘却义务，凡事对于他个人有点小小利益，为了攫取这点利益，就把人与人之间应有的那种谦退，牺牲，为团体谋幸福，力持正义的精神完全疏忽了。

一个自私的人照例是不会爱国的。国家弄得那

么糟，同自私大有关系。

国民自私心的扩张，有种种原因，其中极可注意的一点，恐怕还是过去的道德哲学不健全。时代变化了，支持新社会得用一个新思想。若所用的依然是那个旧东西，便得修正它，改造它。

支配中国两千年来的儒家人生哲学，它的理论看起来是建立于“不自私”上面，话皆说得美丽而典雅。主要意思却注重在人民“尊帝王”“信天命”，故历来为君临天下帝王的法宝。前世帝王常利用它，新起帝王也利用它。然而这种哲学实在同“人性”容易发生冲突。表面上它仿佛很高尚，实际上它有问题，对人民不公平。它指明作人的许多“义务”，却不大提及他们的“权利”。一切义务仿佛都是必须的，权利则完全出于帝王以及天上神佛的恩惠。中国人读书，就在承认这个法则，接受这种观念。读书人虽很多，谁也就不敢那么想：“我如今作了多少事，应当得多少钱？”若当真有人那么想，这人纵不算叛逆，同疯子也只相差一间。再不然，他就是“市侩”了。在一种“帝王神仙”“臣仆信士”对立的社会组织下，国民虽容易统治，同时就失去了它的创造性与独立性。平时看不出它的坏处，一到内忧外患逼来，国家政治组织不健全，空洞教训束缚不住人心时，国民道德便自然会堕落起来，亡国以前各人分途努力促成亡国

的趋势，亡国以后又老老实实同作新朝的顺民。历史上作国民的既只有义务，以尽义务引起帝王鬼神注意，借此获取天禄与人爵。待到那个能够荣辱人类的偶像权威倒下，鬼神迷信又渐归消灭的今日，自我意识初次得到抬头的机会，“不知国家，只顾自己”，岂不是当然的结果？

目前注意这个现象的很有些人。或悲观消极，念佛诵经了此残生。或奋笔挥毫，痛骂国民不知爱国。念佛诵经的不用提，奋笔挥毫的行为，其实又何补于世？不让作国民的感觉“国”是他们自己的，不让他们明白一个“人”活下来有多少权利，不让他们了解爱国也是权利！思想家与统治者，只责备年轻人，困辱年轻人，俨然还希望无饭吃的因为怕雷打就不偷人东西，还以为一本《孝经》就可以治理天下，在上者那么糊涂，国家从哪里可望好起？

事实上国民毛病在用旧观念不能应付新世界，因此一团糟。目前最需要的，还是应当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各方面共同努力，用一种新方法造成一种新国民所必需的新观念。使人人乐于为国家尽义务，且使每人皆可以有机会得到一个“人”的各种权利。要求“人权”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它实在是一切现代文明的种子。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能自由思索，自由研究，自由创造，自然比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蠢如鹿豕，

愚妄迷信，毫无知识，靠君王恩赏神佛保佑过日子有用多了。

自私原有许多种。有贪赃纳贿不能忠于职务的，有爱小便宜的，有懒惰的，有作汉奸因缘为利，贩卖仇货企图发财的。这皆显而易见。如今还有一种“读书人”，保有一个邻于愚昧与偏执的感情，徒然迷信过去，美其名为“爱国”；煽扬迷信，美其名为“复古”。国事之不可为，虽明明白白为近四十年来社会变动的当然结果，这种人却卸责于白话文，以为学校中一读经书，即可安内攘外；或委罪于年轻人的头发帽子，以为能干涉他们这些细小事情就可望天下太平。这种人在情绪思想方面，始终还不脱离封建遗老秀才的基本打算，他们却很容易使地方当权执政者，误认他们的捧场是爱国行为，利用这种老年人的种种计策来困辱青年人。这种读书人俨然害神经错乱症，比起一切自私者还危险。这种少数人的病比多数人的病更值得注意。

真的爱国救国不是“盲目复古”，而是“善于学新”。目前所需要的国民，已不是搬大砖筑长城那种国民，却是知独立自主，懂拼命学好也会拼命学好的国民。有这种国民，国家方能存在，缺少这种国民，国家决不能侥幸存在。俗话说：“要得好，须学好。”在工业技术方面，我们皆明白学祖宗不如学邻舍，其

实政治何尝不是一种技术？

倘若我们是个还想活五十年的年青人，而且希望比我们更年轻的国民也仍然还有机会在这块土地上活下去，我以为——

第一，我们应肯定帝王神佛与臣仆信士对立的人生观，是使国家衰弱民族堕落的直接因素。（这是病因。）

第二，我们应认识清楚凡用老办法开倒车，想使历史回头的，这些人皆有意无意在那里作糊涂事，所作的事皆只能增加国民的愚昧与堕落，没有一样好处。

第三，我们应明白凡迷恋过去，不知注意将来，或对国事消极悲观，领导国民从事念佛敬神的，皆是精神身体两不健康的病人狂人。（这些人同巫师一样，不同处只是巫师是因为要弄饭吃装病装狂，这些人是因为有饭吃故变成病人狂人。）

第四，我们应明白一个“人”的权利，向社会争取这种权利，且拥护那些有勇气努力争取正当权利的国民行为。应明白一个“人”的义务是什么，对做人的义务发生热烈的兴味，勇于去担当义务。要把依赖性看作十分可羞，把懒惰同身心衰弱看成极不道德。要有自信心，忍劳耐苦不在乎，对一切事皆有从死里求生的精神，对精神身体两不健康的病人狂人

永远取不合作态度。这才是救国家同时救自己的简要药方。

给青年朋友

本省今年的集中军训，旧历中秋就告结束。这次集训留给多数人一个不良印象，实在无可讳言。失败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对负责方面言，不如过去平沪集训之有计划，有办法，一起始就看得出。对受训学生言，把集训当成照例的故事也有关系。我是个吃过军营饭的人，深受入伍训练严格的益处，明白它意义的重大，所以想把失败责任的一部分，放在青年朋友对于军训态度上。大家由于过去对军训的态度，只把它当成一种“大学生受委屈的义务”，从不把它当成“作国民的义务”，这种轻军训的态度，就可以使集训陷于无可避免的失败。大家都以为打仗是粗人干的事情，有团长、营长、班长、兵士去负责，在大社会分工合作意义上，大学生另有大学生的职务。因此在受这种特殊教育时，不仅仅是没精打采，十分勉强，

并且许多还在有形无形之间加以反抗。这只要各人想想，平时对于校中军训的规避与嫌恶，就可明白。这种态度的形成，和过去中国政治状况自然极有关系。中国是个雇佣兵制度的国家，吃粮是某一种人的求生方法，并不是全体国民求生的方法。吴大帅有他自己的军队，张大帅也有他自己的军队，或以人为单位，或以省为单位，他们闹意见时，就发生战争。若就过去二十年种种内战来考察，打仗的确不是大学生所应作的事。亏得大学生不参加，少作无味的牺牲，为国家保存了些元气。（大学生本来的用处，是能够从学校中学得若干普通知识，弄明白某种专门知识的路径，到毕业后，看机会和能力，或升学，或教书，或转入相当机关服务。国家若有组织，政治上了轨道，大学生的出路必然如此。）中国近数年来在建设方面，经济方面，以及各部门学问，如考古和地质，……有点成绩拿得出手，都可说是大学生能在分内尽职的结果。可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个人对于国家应负的责任，是视需要随时变迁的。即如说战争，过去军阀时代的争夺内哄，我们处于一个旁观者情形下，不合作，不过问，事办得到。可是现在大敌当前，举国同仇，何况对方又是一个凶狠横蛮的民族，五十年来处心积虑，用尽各种鬼蜮伎俩，豪夺巧取，侵略我领土，削弱我民族生存能力，想慢慢毁灭我整

个中国整个中华民族，我们力图自卫自存而战，这完全对外的战争，当然人人有分！

现在这种战争已继续了一年，在为中华民族自卫自存勇敢作战光荣牺牲的，伤亡已将近百万人，参加战争的，动员不下三百万人，因战争影响，死亡流离的，不止两千万人。在战场的后方，每天必有一百架两百架敌人飞机，载了上百吨炸弹，到处随意轰炸，大学校被毁去的约三十校。在我阵地上，还每日有数百吨极猛烈的和有毒气的炸弹爆裂，多少人在这种光景下挣扎拼命！试想想看，这是一幅如何凄惨、壮烈的图画！凡稍有血性，不愿自外于中国国民的青年，都必然会明白这战争的意义如何严重，如何与过去内战不同，如何需要把自己力量加到上面去，方能抵抗强敌，免于战败后作亡国奴！大学生知识比一般国民都高得多，对于这次战争的意义也应当认识得更深刻。近代战争重要在“技术运用”，新兵器和新战术，两方面都离不了“人”，必需人在一单位上能尽职，在一群中又能协作，方可望产生良好效果。使人人能在极有条理极有秩序情形中尽职尽责，唯一的方法就是训练，一种极端严格的训练。大学生在平时固然是个“特殊阶层”，在战时却只是一个“国民”。军训的目的，即或不是这时要大学生参加战争，至少也是希望国民在这种教育上，明白战争是怎

么回事，有所准备，到需要时，还得照学生所习熟的一句话“迎上前去”卫国守土。

本期集训之初，即发生“训练不合法，待遇太差”的纠纷，所谓不合法，是大学生不宜再受入伍士兵教育，所谓待遇太差，不过是住得稍坏吃得稍坏罢了。青年朋友以为入伍训练便近于受侮辱，待遇差更近于受虐待，纠纷的起因如此，理由如此。到后负责者方法变更，纪律一马虎，青年朋友装病告假人数之多，用说谎取得自由，以及滥用自由，得自由时俨然一个流浪汉的所作所为，说来就不免令人痛心。天真烂漫固然难得可爱，但许多人若到了应当思索个人与国家，生存方法与生存意义的年龄，还天真烂漫，不知自爱，自重，不以说谎为羞，不以懒惰为耻，不以糊糊涂涂拖混为可怕，把读书也当成家庭和学校派定的义务，不认为是自己的权利。不肯受初级训练还可说是反抗心和自尊心的表现，到无人麻烦时，自己还是不会振作自己，这就难言了。在集训期间，正义路上随时都可以遇着一些神气萎萎琐琐，走路懒懒散散，或者有时且同一只松鼠一样，一面走路一面从容不迫咀嚼瓜子松仁的学生。再到什么宿舍去走走，卧房中的杂乱无章，以及三三五五同学兴趣集中所在，吵吵闹闹，令人感到时间之浪费，如何骇人！大学生对于将来的建国责任特别重大，这就是我们

理想中的学生吗？这是受军训的学生吗？这些人究竟是为什么活到地面上？

这些事看来很小，其实却异常重大。因为从种种现象中，我们可以明白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一部分大学生，活下来实在不知为什么活。对生存竟象是毫无目的可言。行为是呆呆的，脑子是木木的。既少严肃，也不活泼。任何好书都不能扩大他的想象，淘深他的感情。任何严重事实也不能刺激他的神经，兴奋他的正义感。归究说来，这些人活下来传世诀，竟仅有一个混字，考学校时混及格，入学校后混毕业，出了学校到社会上讨生活，还是混。进取心毫无，对国家改造的雄心与大愿更极端缺乏。唯一见出他还象一个活人，还在活还想活，不是求生技巧的进步，倒只是环境有点混不下去时，如何齧觫惶恐怕死逃生！然而这种怕死的情形，却正反映出这种人如何愚蠢与无知！我们都知道关心前线的阵地转移，可疏忽了后方的萎靡堕落。这不成！如果军训入伍教育受得好，或另外能从书本上稍稍输入一点作人教育，就不至于有当前这个现象了。

不过话说回来，这种可悲现象虽存在，也可说是“少数人”的事，是“过去”的事。另外多数大学生过去埋头苦干的精神，以及希望将来把知识和能力献给国家的精神，仍然是到处可见。如本市昆华师范

学校被炸时，许多学生和某某教授对于救助伤者的种种勇敢精神和行为，实在使人敬佩。如今战事还在继续延长扩大，国家遭遇的困难越来越多，个人所处的环境也越来越紧张，前方和后方对战争意义虽不同，态度却需要相同，最低限度是不气馁，各尽其责来坚忍支持，死亡不幸分派到头上时，沉默死去，死亡还不近身时，有一口气，就得打起精神好好的来作一个人！西南联大学生大多数是由沦陷的平津京沪各地来的优秀分子，几个地方的学生，平时以领导全国青年运动著闻，活动是常态，消沉是变态。这时节青年朋友可做的事情正多，即或不能向社会有何主张，至少在同学中造成一种崭新风气。纵不能上前方同敌人作战，还可在学校中向“懦弱”、“颓废”、“萎靡不振”以及种种充满于一部分学生心目中的不良倾向消极观念而战。青年朋友不是都觉得入伍训练早已完成，训练的反复近于侮辱？入营后住的坏吃的坏是受虐待？我们若能够把受过入伍训练以后，还缺少军人勇敢沉毅的气质视为更大侮辱，把住的好，吃的饱，活下来无所为无所谓视为更难忍受的虐待，若人人都能律己自重，都具有“天下为己任”的仁爱雄强作人精神，都肯改造自己，在某种生活态度上简朴单纯，爱秩序，守纪律，完全如一个大兵，明日的一切情形会与现状不同许多。我盼望有这种青年朋友，

且相信有这种青年朋友，从本身起始来努力，作一个人，作一个中国当前所需要的国民，先在生活态度上，建立一个标准，一种模范，由此出发，再说爱国，救国，建国。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

一 种 态 度

近十多年在各种刊物上最常见的是“民族精神”字样。今年又为“精神动员”。就常理说，所要准备动员的“精神”，应当就是先前一时谈及的那个“民族精神”。可是中华民族精神，在时间上有连续性，在历史上起大作用，在当前抗战、明日建国两件事上且具有种种可能发挥的伟大力量，是些什么？说到它的却似乎并不多。因此民族精神这个名词，转成坚实勤俭行为，表现上好象极具体，实在很空泛。固有“精神”有些什么东西，值得发扬、恢复、光大，倒不曾提及。谈什么东西文化的，也照例抛下这个名词，不作诠注。仿佛大家都已常常提起，大家就应当早知道了。凡知道了的，自然不用再说。可是看看各方面论客的持论，便可知这名词意义十分暧昧。解释民族精神伟大处较好的，还让冯友兰先生最近在《新动向》

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那文章题名《赞中华》。就中说起中国伟大，实建筑在儒墨道诸家思想薰陶启迪上。中国人有儒家的严肃，墨家的朴实，道家的潇洒，表现人生态度或“有所为”，或“满不在乎”，所以民族永远不会灭亡。并以为两年来的抗战，军事上虽败北崩溃，政治上反而越打越进步，处处见出新机，就显明表现这伟大民族精神如何值得重视，且因它的存在，值得乐观。冯先生话说得很好。从全面看，中华民族在儒墨道诸家思想涵育中有个光辉灿烂的明日，自不待言！惟从部分人观察，似乎就有点不同。我意思是我们倘若肯具体一点，试从二十五岁到五十岁左右某一部分留在后方的知识分子来观察，看看这些人于中国古代伟大思想究竟受有多少影响。所得的结论，我们会不免失望。我们会发现原来儒家的“刚勇有为”态度，墨家的“朴实热忱”态度，道家的“超脱潇洒”态度虽涵育于一般人中，影响于“读书人”却不怎么多。“读书人”是个通泛名词，我这里想借用他专指现在教书读书的一部分人。这些读书人知识虽异常丰富，常因近代教育制度或社会组织，知识仅仅成为一种“求食”的工具，并不能作为“做人”的张本。“严肃”用于门户之见，与信心坚固无关。“潇洒”近似对事马虎，与思想解放无关。真影响他们支配他们爱憎取予的，差不多总是一个

小小团体，一群数目不多的朋友，三五同事，七八同学，十来本书。（团结他们的，有时还是一桌麻雀牌！）若说以前人受家族制度拘束，现在可说受生活团体拘束。因为生活范围小，所以个人兴趣窄，公众精神和感情即不大发达。儒家最美丽的认真“为公”精神，在读书人中且有日趋萎缩之势。好些名分上应属于“公”的，这些人作起来更容易假公济“私”。这类事大致随处都可耳闻目睹，也用不着多提了。至于因老庄思想而来的满不在乎处，读书人不免受日常吃喝起居习惯限制，看不出什么超脱飞扬意趣，易发现的，倒是容易把生活观念粘滞在人我小小琐碎得失上，施展不开。不特行为矜持拘泥，装模作样，即想象表现于文字语言时，亦无不显得非常贫薄无味。凡此种，多属眼前事实。社会组织与生活方式，形成这部分知识分子普遍的弱点，蕴藏于内；表现于外，则是无生气，则是乌烟瘴气。所以我们若承认儒墨道哲学思想，刚勇、朴实、超脱，与这个民族光辉不可分，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当前读书人中正如何缺少这种优美德性。因缺这种优美德性，所产生的病态，实在相当严重。大家应当就见到想得起的事情从小处努力，尽可能来谋改善。假若拿笔的朋友还相信文学艺术在社会上有一点力量，新的文学艺术便可从这方面下手，表现出一个综合的新的理想，新的

生存态度。有心人应当承认用这种态度来写作，似迂腐，实健康。虽易触恼当前男的女的村的俏的少数有权威性读书人，对于另外多数将来读书人，或者还有点好处。

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报国机会

——给湘西几个在乡军人

××同乡：

一九一七年秋，我离开家乡后，就在湘西十多县来回转，受本县人所受那种“教育”。老老实实说，就是追随一个军匪不分的游击部队，这里那里流动各县各乡寄食。客店里，破庙里，船上，税关上，无一不住过。有什么吃什么，到必需走路时即刻背包袱上路。有事干不管大小，照例不辞。无事作也拖拖混混，不甚忧虑委屈。有关学习，总是就情况许可，尽力去找些杂书看。这种教育我整整受了六年。现在和别人谈起，近于一种奇迹，但和同乡朋友比较，还是大家一样！（若说过去受苦，一定有许多年轻同乡比我还更苦。若说未来希望，这时节只要大家肯干，希望实在比我大得多，机会也比我好得多。）

一九二二年，我忽然发生另外想头，觉得这样混下去不成。世界很宽广，得趁年纪青，气力壮，多见点世界。所以离开家乡，独自跑到北京，忍饥挨冻，生活再困难也不绝望。在北方十多年，离乡太久，太远，极惭愧，对地方什么忙都帮不上。可是总努力作个硬朗的人，保持湘西人的长处，不敢堕落丢地方人的丑。年来从亲友口中和通信上知道好些同乡已由学校转入军队，成为前途光明的少壮军官。有些又在连年内战中牺牲了，失踪了。有些又发了财，已作了戴铜盆帽的新式员外。更有些持身不大谨慎，沾染了不良嗜好，坐守家中，很艰难困苦无望无助打发日子。正如昔人所说，十年兴败许多人，令人感慨。在事业上成功的，我十分敬重，在生活上失败的，我也非常同情。正因为我知道有许多同乡，本质都好，体力和智慧，全不下于人。吃大亏处只是对生活缺少向上理想，缺少现代人的训练，不肯用新习惯管制自己。且由于地方闭塞，拒他性特别浓厚，对外来有意义思想照例不大瞧得起。为人虽勇敢，用不得当，依旧常常表现在个人私斗和意气争持上，追求知识的勇气并不多，改革旧习惯的意志尤难持久。精神上独立性不发达，因此在谋生方法上，有一领袖，尚可因缘为生，领袖走开，就不能独自为战。加之结婚太早，易为妻室儿女累，到有所图谋力争上流时，又牵牵绊

绊脱身不开。失业一久，嗜好上身，更自然而然养成一种极可怕的消极悲观心理，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如此，把屯蹇付之“命运”。记住家乡两句老话，“时来运来，门板挡不住，时去运去，绳子缚不住。”一切有命，不可强求。又不屑于作小事，扎扎实实守住本业干下去。更不屑于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惟坐以待时。有时机会已到，因体气衰弱，无决断心，亦不免轻轻放过。少数同乡因饥寒交逼，对人事悲观心理渐转变为行险徼幸，于是闹成地方问题。当事者明知其事，不作理会，激迫生变，终于燎原。然而同乡得些什么？集众千百，龙蛇不一，凡无知之徒所作所为，无不该为同乡所作所为。同乡得到的，不过“鱼肉地方”一个骂名而已。

去年十二月，我回到长沙，有朋友请我吃饭，就被人称为“湘西土匪”。当时以为只是无意中说的笑话。后来又听几个同乡前辈说起家乡年来种种，我觉得很痛苦。我知道，倘若内政清明，外来地方官吏能不以征服者自居，爱民，恤民，家乡老百姓绝无生事的道理。以身许国的壮士，能得一贤明有威望人作领导，人人有饭吃有事做，更不会啸聚为匪。如今一部分有为青壮，铤而走险，以占山落草为荣，且认为是唯一自存方法，地方负责者，实在应当自疚，忏悔。到后，又听说现政府很明白这问题，行将有一个办

法，使爱国者不至向隅，欲抗日者不致无从抗日。当局或将请同乡所爱护信仰之领袖，勉为其难，负责收拾地方局势。听过这消息后，我很高兴。方以为国事迫蹙，在在需人。这次抗战，湖南同乡诸勇士卫国守土精神，使人感奋。嘉善之役，本乡部队血战七日，后来者行将更有所表现，自不待言。个人即不能追随同乡之后，上前杀敌，至少必忠忠实实，就力所能及将同乡所得甘苦经验，写成一本书，给全国人知道，先前他人诬湘西地方为匪区，诬湘西人士为土匪，种种不能辩、不足辩之诬蔑，湘西健儿将用对外流血来说明。湘西人过去有不得已的苦衷，并不乐于作匪。只要领导得人，实在是重造中国不可少的一分子。同时也使我家乡后起之秀，在建国大业上，知所以自爱自重，奋发有为，不落人后，为中国人争一口气，为湘西人争一口气！谁知过不久，又听说情形有了变化，理想不可期，详细经过不得而知。只知道问题甚多，各方面都有问题。

国家已到这种样子，要把它弄好，绝不是一二人坐而谈起而行就可上轨道。大家既认为湘西问题极复杂，想解决它，不从各方面来认识，如何能解决？我因为生长地方关系，知道问题症结所在，且坦白无私，想就个人所见所信，对于这问题从各方面看，负责者宜如何认识湘西，湘西人——正当士绅，青年学

生，在乡军人，应如何共同努力，来重建一湘西。小言之，地方能安定，大家可少受点痛苦。大言之，地方能安定，方可望建设繁荣。可是糟得很，话一说出就有人疑心“这有用意，有作用”，不容再说。“国家有道，庶人不议政”，于是我不再作声。政府倘真正关心湘西，能把湘西治安维持，人民痛苦减轻，为地方积德造福，使国家无后顾之忧，岂不很好。所以见报上说某某部已经点验了，某某人已经表态了，我个人总觉得特别快乐，并不因为个人意见受限制而难受。可是直到现在，有好几个县分还是行旅戒途，不易走动。春耕在即，匪势转炽。这些事当然不是同乡所能负责。主政者对于问题根本，或许还待有更好认识，自不待言。同乡中自为雄长各不相下心理，也不足使一切事难于进行。救国不分大小，不是一个人的私事私利益，大家若都想作“大官”，不想作“大事”，如何抗日？平时作官，官作得越大，就越威武，好处越多。这时是什么时候，现在敌人正在我们中国另外一大片土地上，日夜杀人放火，把妇女不管老幼，捉去轮流奸淫，把小孩子戳在刺刀上玩，任意糟蹋中国，充分发挥兽性。你个人在本地方即或官做得再大，有什么意义？有一百枝枪，一千枝枪，拥众割据一个山寨，就自称为总司令，总指挥，不管地方受得了受不了，对国家是不是个罪人？政府如今需要人

民参加抗日，你们若还为官职大小、待遇厚薄斤斤计较，不肯把对国家的责任心理改变过来，当不是坐失爱国机会？年富力强的，作兵士，官长与士兵，名分虽不同，价值可一样。一个真正爱国者，上战场时只看能不能尽职，不会嫌官大官小。我有个朋友，五年前辞了国立大学校长职务，亲身跑到北京一个小学校去教书，教他自编的课本。要做一个人，这点苦干硬干精神，值得学习。

读书人事情且不说，说说同乡容易知道的。这次一二八师全部官兵，在嘉善一带地方，用一些简单轻便武器，奉命参战。某一营官兵，藏在壕沟里，和被炮弹炸成的孔穴里，任敌人飞机大炮拚命轰炸，一天落下六百枚炸弹，还是死守阵地不退。到后一营兵士仅仅剩下十六个人，营长负伤了，连长排长死光了，这十六个同乡，见敌人前进，居然还爬出壕沟，和敌肉搏。另外一次，因为阻敌前进，必须炸毁公路上的桥梁，有三十个同乡，从公事中爬出，带了炸药、手榴弹、轻机关枪，从水田里爬到桥边去。目标被人发现后，七架飞机给三十个勇敢同乡，投下一百多枚炸弹，每人平均约三四个，附近被如土地同新耕过的田一样。三十个人死伤了二十四人，剩下六个。有两个兵士，居然爬到桥边，抛了五个手榴弹，把桥头敌人机枪阵地消灭后，终于把六十个黄色炸药包绑在桥

边撑柱上，用雷信接火把桥炸毁了。这兵士一个姓滕，是黄狗冲乡下的，一个姓宋，城里人，年纪都只有十六岁。另外一次，有一个连长，在掩体内作战，腿上、手上、脸上，带了轻重三次伤，兵士要他退下，他不肯退。一连人大部分已伤亡，只剩余十一个年青兵士。这连长和十一个兵士守在一个最不利敌人同时又最重要的地点，未了工事被炮弹击中，那连长只剩下两只脚，被那唯一生还的忠勇的勤务兵抱回。连长姓陈，廖家桥乡下人。

这类慷慨激昂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说不胜说。只要想想，一师人开到前线去，血战七昼夜，白天敌人三四十架飞机轮流来轰炸，晚上部队又得趁方便夜袭，有些同乡工事和后方隔绝了，七昼夜不吃，不睡。血战的结果，四个团长受伤，四个团附死去三个伤一个，十二个营长死去七个，伤五个，连排长死去三分之二，负伤三分之一。兵士更难计。看看这个数目，就可知道同乡在前线的牺牲如何大如何壮烈！他们为的是什么？不是爱国家，拥护全面抗战，谁能如此勇敢牺牲？这个部队向来是被人误解轻视的。总以为是土匪，是从土匪窝出来的破烂队伍。由于长官识大体，士兵能服从，为地方争气，为国家争气，一切从远处看，这点委屈上下都始终忍受。苦一点，忍受下去。待遇薄一点，忍受下去。三年来转调各处，上

下吃苦，毫不灰心，一直到全师被一列火车，半夜里由杭州载运赴最前线去，从一个破烂不堪的车站下车，无一个参谋部人员指导，无一个向导带路，在湿雾迷深中搜寻派定防守的国防工事。全城人已走空，只剩下一个县长，手提一串编了号码的国防工事地堡钥匙，把钥匙交给了来接防的副师长，便随同那一列军车走了。刚刚得到位置，天一亮，大队敌机即来轰炸。你想想看，被敌人炸了整整七天！直到任务完成后，才奉命调回后方休整。一些兴奋过度，饥疲交攻，面目和衣服全是血污和泥土的剩余官兵，集中在杭州车站旁，听候训话，还是默然忍受！谁不是母亲十月怀胎血肉做成的身体？谁无妻室儿女？谁不对生活有点希望和野心！可是知道国家事大，个人事小，就始终只有忍受。死的死了，早在责任所在土地上烂了。受伤的由于当时战事过于激烈，来不及救护，留在阵地，被敌人刺杀，同样烂掉了。仅有一些未负伤的，至今还在前线作游击战。（前不久报上登载一勇士手杀四敌人，烧汽船七艘，就是我们同乡所做的。）负伤返回后方治疗的，创伤刚好，还不到休养期满，又已经于日前作为荣誉军团，在常德接收了新的补充兵，赶上前线。这些人急急忙忙跑到炮火下去，有什么好处？作官长的何尝不会在家享福？作下级军官的何尝不会在家休息？不顾大局的何尝不可以上山

落草？可是战事教育了他们，他们都知道要国家存在，个人方能够存在。国家破亡，个人除了作无心肝的汉奸，狗彘不如，国一亡男的行将给成为敌人的牛马、女的不拘老幼都得受污辱。他们知道这种情形清清楚楚，不忍看中国人受苦，所以他们不顾一切，继续上前作战，他们的口号是哪怕剩一兵、一卒、一粒子弹、一只手，还是不屈服，不后退。这才象个湖南人！才象个镇彘人！他们大多数是你们的同学，同乡里街坊，有些一定还是老同事、表兄弟。他们能够这样勇敢，你们岂有不如他们的道理？你们还好意思用任何理由对国事不过问？

同乡的性情，本质上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不畏强暴，仗义而能济人之急，具英雄本色，且以得人敬重为荣。如今最残暴最丑恶的莫过敌寇，最需要帮助的莫过我们苦难的国家！最近于英雄行为的莫过齐心协力共同抗敌，最得人敬重的莫过于到前线去收复失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同乡真有眼光，取舍是极容易决定的。一个人充其量能活一百年，活得有意义有生气还仅仅二三十年。过去三十年来的内战，从中升官发财的固不少，但个人虽升官发财，对国家实在毫无好处。这种升官发财的内战，现在已成过去，国人都知道不宜再有，也不应当再有了。千载难逢对强敌的抗战，如今却正在继续发展。同乡报国机会既

多，实在不应当自外于中国国民。

我说的话很坦白。我不是要作官（因为作官对我一点不上算），不是袒护谁（因为我不属于任何党派），不是为私人利益（我从无发财打算），只为自己是一个国民，一个镇算人，眼看国事那么严重，十多年不回家乡，一回来就见到两种现象：一种是大群刚从前线负伤回来的同乡，有些创口尚未全好，因为知道前方需人，又各自不声不响离开了他的家，抛下了年轻的妻室和周岁小孩子，向前走去。另一种是本乡或邻县，听人说有多少房子被焚烧，多少人家被抢劫，多少重要事不能进行。把这两种现象对照起来，心中难受得很。凡稍有人心，总不免堕泪。稍有人性，总知道“捍卫国土”和“糜烂地方”什么是有价值，什么是被骂名。话即或说来无益，实在不忍不说几句。大家试想—想，若觉得我说得对，一切从好处做，如今并不迟。若觉得不对，过一阵会明白，只图个人出路，忘了国家，得不到多少好处，良心上真说不过去。

爱国方式原有许多种，可以自由选择。同乡若觉得这时出外不相宜，还等待相当机会，未尝不可以。目前前方作战需人，后方安定同样需人。在后方，总得努力设法要地方有秩序，莫堕落在乡军人的令誉，使身在前方的同乡灰心。安定地方不只是衙门中几

个官的责任，也是一般人民的义务。在城在乡办团防，组织地方义勇队，保卫地方，可作的事正多。同乡谭先生在城区所有的工作成绩，就是一个好例。我湖南辛亥以来，为革命献身诸前辈，如黄兴、蔡锷，遗风余烈，相去未远，事在人为，愿各同乡努力。

沈从文

一九三八年冬，在长沙

变 变 作 风

古诗说，“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日月转易是个自然现象，感慨话用不着说，空洞乐观也无多大意义。我们既活在炮火中，总得想法活下去，而且必然愿意明天比今天活得更好。怎么样就会好？值得思索思索！

我们这个国家为了求发展，求生存，更为了尊重一个象征人类光明进步的原则——民生主义，独立作战快有三年半了。战争虽一时失利，可不气馁，虽被强敌侵占了许多土地，大都名城，小县小镇，或为人血染赤，或成一片瓦砾，不以为意。最能明白体会到这种战争意义的，恐无过于报人和学生。这两种人一定都能知道，我们其所以应忍受，能牺牲，就为的是这战争背后，还有个庄严伟大的理想！这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我们却必须终其一生，永远保留这个作

战的精神，打胜仗后方能建国，打败仗时方可翻身。

但“战争”这个名词是包含多方面的，前面要人后面也同样要人。目下前面我们有两百万武装健儿，与敌人在广大土地上周旋，在后面，可作的事也就不少。可是我们究竟作了些什么事？我们应当承认，直到如今为止，后方有许多事都近于消极应付，不是积极进行的。即有关国防设计各重要事业，负责人肯作事的固然不少，怕作事，懒作事，不会作事因而误事的，也就到处可见。公务员之不讲效率，对生命无目的，无理想，可是显而易见。且因生活物价增高，一种可怕的“实际主义”日益流行，腐蚀多数人做人的良心、做人的勇气。既缺少一种高尚感情，当然也就缺少用那个感情去追求一种人类庄严原则的勇气。说抗战，固然有两百万战士在炮火中，说建国，用那么一群人来支持中层阶级处理国事，从何说起？在这种情形下，个人以为趁这一年起始的今天，很值得检讨一番，看看我们这个社会，还有多少方面工作值得修正，还有多少潜伏力量值得好好发掘。国家忧患那么深，国民责任那么重，如我们不能在普遍国民中（尤其是知识阶级中）造成一种坚韧朴实的人生观，恐怕是不能应付将来的！提起这一点，试从近二十年过去国家社会的变迁看看，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即文学革命。且会承认一件事情，即文学革命后，用文字

作工具，用得其法，对社会改造有多大贡献，对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恢复增加，又有多大贡献。

这种贡献在过去，是用如下形式产生作用的，即报上有一栏社论，对社会各方面作广泛的善意的批评，以及合理的建议。又有一栏名叫副刊，民八以后梁任公、胡适之等人的学术论著，罗素、杜威的演讲词，以及男女解放社会改造各问题，鲁迅、冰心新文学作品与读者对面，都是由副刊来负责的。它的作用大意义深，是有目共见的。因为报纸每天出，分配又广，自然作用大，意义深。且无形中又有一种公众裁判，凡报纸知为国家社会福利设想，即受爱护鼓励，若只图一时取巧，或以不正当目的争取读者，不可免要受鄙弃。因此报纸本身也就得到极大进步。抗战以后国内各处报纸有个共同现象，社论多偏重国际问题，或重在国内外战争胜利解释与社会进步赞美，副刊则因纸张贵，篇幅缩小，或将篇幅缩减移作广告用，图增加收入，或率性取消，少支出一笔稿费。其实从报纸理论说，这么一来就等于把报纸特点取消，把报纸对国家社会批评建议地位取消，且同时还把报纸在近二十年来习惯所养成的教育人民权利取消。结果新闻以外就是广告，再加上一点极易成为明日黄花的国际预言。报纸的积极作用既已全失，办报人在这种情形下，好象除了“忙”以外也就毫无意义，看

报人面对这种报纸，当然也觉无多大意义。

若把眼光放远大一些，我们就会知道如此下去未免可惜。在后方或特殊地方谈建国，何妨从新闻纸上来变变作风。个人以为社论一部分，值得放在青年问题上来讨论来处理。这事看来小，实在并不小。正因为一年变一年，人事新陈代谢的结果，目下的青年，在十五年后就要成为社会的中坚，要在国家各部门机构上来负责任，必须给他们重造一坚韧朴实人生观，方能负责。办副刊，文学理论文学作品也值得有一部分向这方面发展。办报本是费力赔钱的事业，既费力赔钱，力和钱的投资，应当放在这个理想上，是毫无问题的。

目下有一种现象，即凡是在将来社会中有重大作用的大学生，一部分目下还蔽于过去的习气，粘执于名词上的“前进”“落伍”，到实际政治上一混，都只知作小喽罗争位置，变得油滑而诈伪。另一部分又因此反应，把生命与国家分开游离起来，变得自私而小气。更有一部分却不知如何是好，日子过得沉闷而无聊，少生气，志气小，气派小，胆量小是共同情形。一个报纸能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想办法来处理，建设一种健康人生观，宣传对于建国的光荣以及建国意义的重大，实在是极重要的！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五日

读《论英雄崇拜》

本刊第四期有一篇文章，题名《论英雄崇拜》，陈铨先生写的。本意给国人打气，对“英雄”有所赞美，用意自然很好。对于“英雄”含义，文章中虽曾说过是各式各样的领袖，惟内容所指的还是代表武力与武器的使用者，对面自然就是代表读书人的“士大夫”，于是很感慨的说，中国读书人太不崇拜英雄。既提起读书人，要找出一个原因，所以又说，这是由于“五四”的结果！为什么？为的是五四提倡“民治主义”与“科学精神”，养成了士大夫的坏脾气，腐化而且堕落。近代教育教坏了这些读书人，反不如过去受了点通俗小说教育的武装同志表现得动人。我们要崇拜英雄，不然就是个卑鄙小人。有对这种崇拜加以嘲笑的，也是卑鄙之徒。英雄究竟是怎么回事？康德说，英雄有壮美感，使人生神秘敬惧之忱，无条件

拜倒；他要你死，你必乐于死去无疑。……断章取义不是本文写作目的，不过那篇文章给个人读后印象，却不免如此。陈先生解释英雄崇拜时是援引康德、尼采意见，论及中国缺少英雄崇拜时是提及近二十年事，死文字与活事实相互映照，想使它不发生抵触，至少在修辞上还值得细心一些。不然，给人印象或不免失去了执笔本来意思。个人是个不大“崇拜英雄”的人，但想想也还不象“卑鄙小人”，有些与陈先生不同意见，特写出来作为对这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中国旧书中论及英雄时，刘劭《人物志》说的大有意思。他说能控制一切而持其柄，统率文武，使用器材各得其宜，可以谓之“英雄”。这种英雄观很显明到如今还适用。真英雄换言之就是“真的领袖”，并不是“万能法师”。我们生于二十世纪，对待这么一个英雄，自然也只是大事信托，由信托而生敬重，不必迷信崇拜，尊之若神。正因为明白英雄只是一个“人”，与我们相差处并非“头脑万能”，不过“有权据势”。维持他的权柄，发展他的伟大，并不靠群众单纯的崇拜，靠的倒是中层分子各方面的热诚合作！二十世纪两个近代化的国家领袖，罗斯福和斯大林，所谓作领袖的意义，便是如此。个人权力尽管其大无比，事实上各事有人负责，个人不过居于提纲挈领的

地位，总其大成而已。读书人对于他崇拜不崇拜，是无所谓的。

提及英雄崇拜时，陈先生引用百十年前叔本华、尼采一类人对于这个名词所作的抒情说明，与时代实不大相合。这些人的英雄观多属“超人”，配上拿破仑的性格风度倒刚好合式。这种英雄于战争中必骑一匹高大雄骏的白马，在山头大纛下据鞍顾盼，群众则野战格斗，破阵陷敌，有进无退。可惜时代已过去了。慕索里尼和希特拉两位要人，在群众大会拍摄新闻电影片时，虽尚倾心这种古典英雄风度，装作雄鸡姿势，已不免令人发笑。若在法比战场上最前线，我敢同任何人打赌，这两位伟人就决不会比一个二等兵乐意把头多昂起一英寸！这就叫作时代不合，伟大意义也不会相同。英雄崇拜若近于群众宗教情绪与浪漫情绪之归纳集中，近代使用的方式是分散到社会各方面去，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玩球的，跑车的，爬山的，游水的，无不可以引起这种集中的作用。英国封一个戏子作爵士，瑞典给一个电影女演员颁发勋章，这是国家有意从群众中产生英雄的例子。罗斯福有时会为足球比赛发发球，斯大林大排场款待从北极探险回来的水手，这又是现代伟大意义不同的另一例子。这事值得注意处，便是真的领袖都有意将英雄崇拜情绪转移到娱乐或致用分子方面去，个人

却承受了“民治主义”一个对于“人”的原则，“领袖也是一个人，并不是神。”他要人相近，不要人离远。要群众信托爱敬，不要群众迷信崇拜。

这其实从国内近事也可看出。陈生先很感慨的说“中国读书人太不崇拜英雄”，倒恰恰与够得上他所称为英雄的蒋先生及李白诸将军，感于迫切需要知识阶级合作帮忙成一对照。陈先生以为抗战建国主要条件是“英雄崇拜”，这些受崇拜者经验多一些，却明白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他们已从各种团体左献一面锦旗，右拍一通电报清楚崇拜的意义和限制，这是不成的！谈抗战，一个战线上若用十师兵力作战，攻守进退需要的全是技术和科学知识，并不单凭个人勇敢热忱与不相干的多数崇拜所能济事！上层机构要一个健全的参谋组织供给意见，下级单位要一个完备的交通组织接济弹械和给养，整个胜败都决定于知识在空间时间上运用是否得法。就为了勇敢有余知识不足，才用外国军事顾问，求助于客卿！至于谈建国，那更非知识不可。说到建国，我们会联想到中山先生本人和他的《建国大纲》。他本人的一生行为，就是要人“相信”不是要人“迷信”的。这个大著的草成，就有许多意见是折衷于老同志与许多书本而来。他就是个“人”，不是神秘不可思议的“神”。

个人以为时代到了二十世纪，神的解体是一件自然不过的事情。他虽解体却并不妨碍建国。如有人从一个政治哲学新观点，感觉东方的中国，宗教情绪的散漫十分可惜，神的再造有其必要，这问题大，决不是单纯的英雄崇拜即可见功。在政治设计上想归纳或消解群众宗教情绪与传奇幻想，神的重造方式正好从近三十年世界取法，这种“致用”之神不妨用分散与泛神方法，从群众中造偶像，将各种思想观念手足劳动上有特殊成就的，都赋予一种由尊敬产生的神性，不必集中到一个“伟人”身上。若真的以一个人具神性为中心，使群众由惊觉神秘而拜倒，尤其是使士大夫也如陈先生所描写的无条件拜倒，这国家还想现代化，能现代化？稍有常识的人看来，就知道是不可能也不必需的！

陈先生提起英雄崇拜时，又举示当前兵士作战为例，以为全得力于老式通俗文学小说戏剧的英雄崇拜的好处。且赘语说亏的是这些人不受普通教育。这种意见由赛珍珠说来，并不可笑，因为她是个外国人，不明白中国事情。若由现代中国人说来，似乎不大近情合理。因为这完全是两件事，勉强附会，不啻说明陈先生既不明白旧小说是什么，也不知道现代战争是什么。若说旧小说的影响，张宗昌、韩复榘倒是两个典型英雄崇拜者。其次是近三十年来所有土

匪都用“逼上梁山”一词作借口，合伙吃血酒时且照例引用“桃园结义”典故。崇拜之中就无不有个“个人本位”意识，与文中所举康德称艺术中的壮美崇拜全不相干。更不曾培养陈先生所理想的由惊觉神秘而来的崇拜情绪。宗教的虔诚由坚信而产生庄严，牺牲一切以赴之，在中国唐代的大德高僧玄奘行传，倒有点相仿佛，但这就只有读书人能领略！若一改成说部的场面，群众就只关心到他进蒸笼被妖精蒸吃时，是否能够得救惶恐了。通俗小说虽有些民族英雄故事，若把当前兵士抗战，认为由这些小说薰陶而来，与事实相去实在太远。

陈先生又说，英雄崇拜在读书人方面表现不好，实由于“五四”以来提倡“民治主义”同“科学精神”，个人主义抬头，士大夫因之更腐化，社会因之更极端紊乱，所以再不会崇拜英雄。在战争中提倡英雄崇拜自然很有意义，不过若涉及知识阶级，且认为他们腐化堕落时，似乎还要分析分析，不宜过于笼统。英雄崇拜情绪，在知识阶级中不发扬原因，前面已经说及，加上社会进步分工分业的结果，英雄名分与事实已不能由“帝王”或“骑士”独占，即在战争中依然被各种职业出类拔萃分子分享，是一件明白不过的事情。陈先生却简简单单以为是“五四”的提倡“民治主义”与“科学精神”结果，这倒是很新的

意见。意见虽然新，却很容易象清末民初遗老的口吻。怎么会这样想而且把他写出来？这时虽是战时，要颂扬武人的武德武功方法也很多，实不必如此曲解过去！二十年前的改造运动，从最小处言，很明显即因工具运动（文体改革）成功，方起新陈代谢作用。通俗小说中旧的如《封神演义》，新的如《玉梨魂》等书，代之而来产生冰心、鲁迅、茅盾、巴金的作品。“团结”“统一”“抗战”“建国”这类名词，由抽象而具体，与工具的能尽其用也大有关系。陈先生说“五四的流弊是更进一步使中国士大夫阶级堕落腐败”，何所见而云然？这士大夫若指晚清遗老，民初议会诸公，人老了，老而不死，体力复竭，手边又还有几个钱，在家纳福，只等待庄子所谓“息我以死”，事极自然。这些人实与“五四”毫不相干。若指因“五四”而起的人物，这些人大多数是当前社会负责者，一部分以专家身分从政，作公务员，一部分或办教育，或作学术研究，工作都相当忙，收入又相当少，守职尽分，近十年来中国见出一点进步成绩，都可说是这种中层分子的贡献。这些人受事实环境限制，能守职不能创业，事或有之。至于腐化堕落，实说不上。这种人一部分在学校教书，与社会略隔一层，或在大时代中尚天真烂漫梦想中国政体忽然凭空变成英美方式，虽尽做白日梦，却又不能如何努力来实现梦

想。

陈先生又说“五四”造成了士大夫无人格，无信仰，虚伪矫饰阿谀逢迎的风气，且以为贪婪爱钱是共通风气，说的也有点近于笼统含混。若指办教育的，与事实不大相合。若指“文臣”意即官吏公务员，这一点也得弄个清楚，“人格”“信仰”范围指什么而言？至于官场中逢迎阿谀，实是一件老故事，与“帝制”不可分，也可说与历史不可分，古语“远佞人”正可作例。说它由“五四”起始倒是新闻。若必把阿谀逢迎归为新的风气，仔细分析，就可知造成这个现象，另外有一个原因。十年来的党政新贵，年在三十五岁上下的，多系北伐时代学生，当时高等教育不良好，一面且忙于革命，学术思想便缺少“五四”提倡的民治主义和科学精神训练。北伐成功后，政体有了新陈代谢，这些各以因缘上了台。不久国共分裂，清来杀去，江西多了一个政府，打了近八年的仗。即在“中央”系统下随即又有桂系分张湖北之役，阎冯扩大会议陇海线之役，福建人民政府事件，两广事件，无一事不与“党”争“政”争有关。既与党政有关，时局变化波澜大，许多人自然把“信仰”看成一个空洞名词。中央欲集权，从党着手，在党中先废除民主精神，乃由上而下以圈定指派方式产生干部。党政中的中层分子，一因学问少，二因时忌多，于是将信仰对象

由“真理”变成“政策”。政局既朝云暮雨，这些末流人当然即不可免各竞技巧表现长处，作人无风格，作事少思想。就中虽不乏洁身自爱者，然欲安于其位，自必唯诺取容。但事情明明白白，这问题系与“党政”有关，与“五四”的“民治主义”和“科学精神”却不相干！至说文臣爱钱，对这种人也还说不上。这种人除了有机会加入财政税收机关，即爱钱亦不会有多少贪婪机会！若与同等的武将比较，恐怕还是将军们发财的居多！（陈先生是四川人，应当知道四川的房产田地，金融实业，几几乎全是大小军官的产业！）此外四十岁以上文臣因专家资格处理有关财政税收事务，虽可发财，还是十分廉洁不失书生本色的，正不乏人。若说五四提倡民治主义与科学精神，这些人倒正可代表承受两种观念产生的人物！至若近十年小官僚因缘时会，位据要津，或直接舞弊，或间接营私，发百万财，称大富翁，正恰好看出国家只图统治，统治方式只注重集权，因此老式亲亲主义与人情主义抬了头，是一种必然现象。救济他靠的还需要社会制度化与专家化，民治主义与科学精神。

大凡谈论问题，能称引“过去”，疏证“当前”，预言“未来”，当然很有意义。不过批判历史，最好要明白历史；攻击科学精神，先还需要具有一点科学精神！我们现在若肯从大处着眼，公公平平来看看这

个国家近二十年的发展，以及在变动中的得失，自会承认有形的社会组织与无形的公民观念，都无不在逐渐进步中。这进步实得力于统一，主要表现是国家统一意识的增强，因统一实现国家日趋于合理。这种进步现象非一人头脑万能，实与中级应用人材质与量提高增多有关，也就与高等教育有关。高等教育能有点成绩，实又得力于若干著名大学在教育范围内的民治主义与科学精神运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不同，这许是个人一种过分乐观看法。但这种看法也还可从近事得到一点证明。举例言，七七战事发生后，在沪杭两路战区铁路服务人员，站站长的或管工程的认真负责处，是中外一致赞颂的。又如目下各战区业已沦陷县分，一经收复，县政工作人员照例即随军事推进而进行各种工作服务热忱也是为人称道的。这些人差不多就全是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即如就税收言，湘鄂省区地方统税，由一个远在湘西某机关指导征收，沦陷区居然能进行，征收人员且很少有携款潜逃事情发生。问及负责人，方知道大部工作人员是税专及其他大学毕业生，仿邮政盐务用考试制度选擢而来。说到英雄崇拜，这些小一辈的士大夫，恐都不免成为陈先生笔下所谓“卑鄙”之徒。因为这种可爱青年，就决不会单凭英雄崇拜能如此忠诚为国的。其服务精神还只是由于作国民的自尊心而来。

正因为每个人所受的训练，刺激，都觉悟了自己是国家一个单位，要生存权利，也就有遵守社会规约的义务。若说国家得重造，士大夫得改造，这些光明进步方面，似乎值得注意注意！明白当前较多，新英雄主义的提倡者，下笔时就知道不仅要慷慨激昂，最重要还是近情合理了。

欧战发展到最近，英法因战争技术比较落后，两个国家标榜的“民主思想”或“自由主义”于是成为一个嘲弄名词。中国处当前情形中，一面得应战，一面得建国，一面得在风云万变国际混乱情形中，选择两个可靠的朋友，适应当前与未来，“国家集权”因此旧事重提。对国家有一个较新的看法，大家分途并进，来把全民族人力物力粘附集中到国家进步理想上去，自是新战国时代应有的打算。可是我们明白，英法倒霉是一件事，五四民治主义与科学精神提倡又是一件事，中国要建国，“国家集权”与“集权国家”又是一件事；三件事各不相附。若以彼证此，附会其词，是不会有较好结论的！若从中国人就中国立场说来，据个人意见，恰恰与陈先生意见相反。国家要集权，真正的“民治主义”与“科学精神”还值得来好好的重新提倡，正因为要“未来”不与“过去”一样，对中国进步实有重要的意义！对外言，“战争人人有分”这句话，想要发生真正普遍作用，是要从

民治主义方式教育上方有成效可言的。对内言，在政治上则可以抵抗无知识的垄断主义，以及与迷信不可分的英雄崇拜主义。更重要的是抵抗封建化的外戚人情主义。在教育上则可以抵抗宗教功利化，思想凝固化，以及装幌子化。在文学艺术运动上则可以抵抗统治与限制，在一般文化事业上则可望专家分工，不至为少数妄人引入歧途。至若科学精神的应用，尤不可少。国家要现代化，就无一事不需要条理明确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若说中国当这个新战国时代，既不甘沦亡，必需挣扎，挣扎方式且必需取法德俄，我们也得弄明白，这些国家最高指导统制权力虽大，其所以控制国家的人力物力，而且运用得恰到好处，并不是人人崇拜英雄可以成事。组织和效率，主要的其实还是科学精神！因科学精神而分工分业，方能有组织，见效率！德国人表示崇拜希特拉，不过是每家被强迫挂一面相片而已，希特拉事实上也许更敬重他的专家和那群高等军事幕僚！若照陈先生意见，“知识阶层关心的平民教育一发达，国家更不崇拜英雄，更是一盘散沙”，那一切初级教育都近于多事，有害无益，大家只读读老式通俗小说，一面对英雄崇拜便很好了。可是话说回来，真正关心这个国家命运的人，会觉得抗战建国事并不那么简单的。

因为世界在战争中，在变动中，新的历史场面上领导者，容易给人一个“英雄”印象。于是一部分人谈及抗战时，谈及国家问题时，便不免要用英雄气分来解释现象，这种联想自会牵强附会到通俗小说方面去，照例且不免把近年来人民对于国家观念之觉醒估计得太低，对“读书人”感到不满。陈先生文章，在这一点上正可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见。读书人情形，陈先生自己是其中之一，当然明白“英雄崇拜”是不是能作到他要你死你必乐于就死的地步。且明白“士大夫”含义，以及其他，有些话不能自圆其说，还不碍事。至于对群众教育，以及从“教育”上得到教训，未免太隔膜了。事实上近三年来国内两百万壮丁的征调，应用如何手续，有若干省分，如何由万千青年学生下乡作民训社训，其次又如何用挑选方法选出送到各地师团管区编训。编训期满，再如何转移到各个应当补充部队去训练，送到前线时，至少都得经过一年以上的“教育”，在教育中与火线上，照例都需要把不必要的懦怯与不必要的英雄思想去尽，只变成集体中一个小小分子，方能作战。明白这些，就会觉得“教育”二字具有何等意义，对于目前战争又影响多大，不至于说外行话称赞他们不受教育了。三年来的抗战，前方百万壮士的流血，后方数百万妇孺老弱在风雨饥寒中完成的几条国防交通线，支持这个

民族作战气概和胜利信心的，决不是英雄崇拜，实完全靠广大群众做“人”的自尊心的觉醒。这觉醒工作，便整个寄托在各种有形无形广泛教育原则上！

陈先生文章本意很好，惟似有所蔽，辞不达意处，实容易被妄人引为张本，增加糊涂。官僚文化人中还不缺少妄人，妄人活下多以为在国家变动中可作政治投机，且习于用英雄崇拜方式固宠取信。这种人正附于中国官僚外戚政治中作种种活动。所以中国谈改造运动，实离不了制度化和专家化，正因为如此一来，这种人方无所售其技。制度化和专家化及新战国时代新公民道德的培养，除依靠一种真正民主政治的逐渐实行，与科学精神的发扬光大，此外更无较简便方式可采。在这种事实下来谈英雄崇拜，如象陈先生那么谈，有点近于“抒情”，不是“说理”了。不知多数读者以为如何。

穷 与 愚

一到双十节，使人总忘不了孙中山先生。中华民国由之产生，是一件事。我记起的却是，因为他在三十年前即明白，中国问题在“穷”和“愚”。社会的腐败与退化，无不由之而生，因此言建国，即针对此两大病根下手。必去“穷”与“愚”，方能把那个外来压力所形成的“弱”去掉，否则无可望。中山先生不幸于二十二年前即作了古人，国人失去一思想深刻、眼光远大、性情宽厚的领导者。然而一切国家重造的理想，还保存在他的学说中，待后来者熟读深思，并理会其用心所在，克服一切困难与挫折，矛盾与两歧，慢慢实现的。

治穷自然为开发地利，征服自然，好好认识地面所生长、地下所蕴藏，加以运用处理。在分配上复有个制度使之比较平均，或有种政策使之渐趋于平均，

国民生活有个转机，整个国家也方有个转机。治愚则为开发头脑，推行个广泛而长久的教育政策，使多数人知识加多，加深，使人人对于新的时代新的世界，能有个新的态度新的习惯去适应，普通人民既感觉到自己是个主人，同时也就是个公民，对国家关系，权利义务分明，因之知自爱也能爱国。政治家既有政治家丰富广博的知识，且有兼容并包的气度，知道珍重国力，不作无意义浪费，而又尊重制度，能用战争以外方式调整一切社会的矛盾取得平衡。换言之，也可说他得艺术、他懂艺术！——象这么一个国家一群人民，把这个国家传统长处好好保持，或想法发扬光大，弱点则努力去掉，如治毒瘤恶疮，国家还会不进步？

然而穷和愚至今似乎尚成为绊住中国进步的两个活结。这活结且若出于一条绳索，彼此牵缠。不论你在上在下，在朝在野，不论是“中国的主人”或“公仆”，凡欲向上挣扎，总不免让这个来自四面八方看不见摸不着的有历史性的活结套住，越缚越紧。这个抽象阻力，不仅来自敌人，自己的普遍而长期的怠工，萎靡不振，且更加强作用。俨若任何高尚理想与合理事实，都无从着手，无从生根。我们对日本算是打了个胜仗，把这个很自大的国家，用我们的长处也用我们弱点紧紧拖住，从而崩毁了。但对我们自己这

个有历史性的弱点挣扎时，直到如今，却真是一个惨败！

我们责谁恨谁都无意义。我们只应当承认这弱点是一种有年分的老病，与全体民族体质多少有点关系，远之与所谓哲学的人生态度有关，近之又与所谓现代政治思想和教育方法有关，我们得弄明白，想办法。这悲剧是中华民族全体的，这责任也就不是少数人可负的！

这挫折惨败的主要原因，从远一点说，我们的历史太久了。帝国新旧交替大一统局面，就延长了二十来朝，还有个偏霸分崩割据的较短时期不算。改朝换代照例是用武力，支持偏安更需武力。在这个历史背景中，读书人就有个“从龙”“附骥”的心理状态，延续了二千五百年。这个心理状态，一直影响到现在，我们得承认那有个历史的鬼在起作用！至于教育呢？从近一点说，恐为由张香涛起始，即只知道救穷，枝枝节节来动手。仅记住管子所说的一句话，“衣食足而后知荣辱”，其他的全不在意。革命轻轻松松推翻了一个帝国。旧的毁去，新的未能建立，属于历史上另一弱点，自然在另一群人生命中又得到抬头机会，即“中原逐鹿捷者先得”的英雄意识。因之有帝制，有复辟，有军阀割地而治的督军团。直到大小书呆子将国家重造观念注入多数年青人头脑中，经过八年，

与少数武力情绪相结合，革命成功了。然而又分裂，又内战，……

在这么一个不安定局势下，支持到九一八，东北完了。也幸而东北热河的完事，真正敌人势力一直侵入平津，我们才有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的警惧与觉悟。福建的人民政府的结束，两广的暗礁和平，以及西安事变的良好解决，都可见出有兵者亦未尝必需用兵。大智若愚，其实不愚。

然而我们还得收另外一种“苦果”，即由教育疏忽得来的另外困难。我们的家长从办新教育起始，比如说，北大的蔡老先生，和教育部范静生先生，本明白教育的理想不止传授知识，还容许有个比具体知识更重要的抽象愿望在内。愿望虽抽象，却能于另一代证实。可是到军阀时代，书呆子办的教育，即连点缀性也缺少了。一省一县小些地方，学生的用处，还可排队持旗到郊外欢迎将军镇守使的凯旋，这些伟人也还可就中挑取绅士人家的女学生作第几房姨太太，逼得那家长不能不允许。大至于北平，似乎从民五六以后，即已与政府完全游离。虽然照例还有个教育部长，除了做官外，中国有多少国立大学，多少学生，就绝不在意。因为只要稍稍在意，就会明白教授有好几年是无从靠公家薪水活下去，关于薪水一定要集团请愿闹了又闹，才在逢年过节时，从什么银行

借一笔钱点缀点缀的！大至国家财政小至个人收入，穷既然是种事实，因此革命成功后，到读书人来作部长时，教育政策不知不觉便成了张香涛总督的继承者，解决穷，提倡理工。另一面或且以为可以使英雄人毅，转入笃实，免去文法中的“思想”混乱。一切针对现实，可就决想不到还有另外一种现实，即世界上有好些国家，地面地下都是穷得出奇的，只因为人民不愚，或直接面对贫乏，解决了穷的威胁，或虽穷而不见穷相，社会上一切有条有理。人民知爱美，能深思，勤学习，肯振作，即产生不出巨万财富，百层高楼，但精神成就上却支配了这个世界大部分，也丰饶了这个世界人类情感和智慧！只除了现代政治作成的中国，不明白那些成就的价值和意义，不特不知尊重，还常常作成不必要的摧残，其余就决无相同的一国，对属于足以教育人类情感的一切，有这样忽视现象的！我们不知可有教育家能想得到，贪污自私的心理基础，还有个比贫穷更深远的背景？即在那些孩子们在受小学教育时代，由于教育者的无知，一面极端缺少图画和音乐，一面却在文史课只背诵历史上伟人名字，一直到现时伟人为止，即作成他们心理上的损害不健全。在中学时代，学生不知文学和美术，而居然有个吃政治饭的打算，引诱他们习于不思不想。到大学，资质好发展比较平均的，入理工，和社

会隔绝游离，自成一统。资质中平，或少年时代即有孤僻性情的，拣文史。而中学时代即准备吃政治饭的，学经济、政治、社会、教育，企图由一小单位扩大而成为一个大据点，十年过去后，这些活动朋友上了台。只想想我们这个中层的组成，我们就接触着这个问题全部了。在这个发展趋势下，我们怎么能希望这个国家上轨道，有秩序，得进步？无怪乎到处是社交式的小聪明，到处是有传染性的拖混与适应，到处是公文八股，而使一切年青人麻痹瘫痪，弄得个国家恹恹无生气？我们一提起官僚，就觉得厌烦。而作官僚的，他们的一切，却是从小学教育即起始的。若国家的教育政策，还在那么一个公式中衍进，到我们第三代，才更是悲剧！

最近，各国使馆设“文化参赞”的消息发表了。我们知道，所谓文化参赞，至少是对于所在国“文化”和本国“文化”具有广泛而深刻的了解的人始能胜任。这种人我们当前有几个？照目下教育设计说来，国立大学就很少开文化史或美术史的共通课程。而近二十年习惯，习文史者不仅难望如五四初期所望，从认识传统建设一新的道路，即当时所诋毁的会哼哼唧唧人材，亦已十分感觉缺乏，而一般趋势，只不过是字义章句间着手，从不让学生从欣赏入手涵泳古人性情人格于历史记载与诗歌表现中，对传

统的精神情感毫无理会机会。这种学生从什么方面可望接受传统，淘深生命，作出新的创造？若照这样下去，我们的文化参赞也就只能象目前许多特种机构一样，得将援留用技术人员例，借材异邦。这多可怕，多可耻！

以个人私见说来，我们物质上的穷有办法，易解决。我们的愚似乎还得一些有心人对于教育有个崭新观念，重新着手。从小学到大学，每一级教育都注意到如何教育他们的情感，疏理它，启发它，扩大它，淘深它。若这件事得从明日“人之师”入手，大学教育近二十年中所无形培养的“愚”，得稍稍想法节制了。而美术、音乐、文学、哲学知识与兴趣的普遍提倡，却可以在十年后，使新的中层负责者再不至于想到调整社会矛盾还用得着战争，儿童玩火的情绪，也绝不至于延长到一个人二十岁以后。

从这些问题上看，代表中国的头脑的北平，还有个新的运动待生长，待展开，事极明显！这运动没有罢课或游行，没有呼嚷哭泣或格杀勿论，只是一些不曾硬化僵化的头脑，能从深处思索，能反应，能理解，能综合，能不为成见偏见所拘束，在一时一事现象上兴奋或绝望，却可以对于一些比较长远的事情，作个尝试。嵩公府有个蔡子民先生的纪念堂，子民先生的学说，似乎值得从此起始，来从教育上扩大它的时候

了。还有个文学运动，我们也还有些事可做，为十年二十年的后来者做点试验。我们这一代本身所经验的悲剧，也许只能用沉默来否定现实忍受下去了。可是生在这片美丽土地上的后来者，应当还可由一种健康希望带到一个稍稍合理的社会中，以及稍稍幸福的生活中！

一九四六年十月八日